

從「同性戀愛」到「走向革命」
〈我的童年〉與郭沫若日後的「自我改造」*
許維賢**

From Homosexuality to Revolution
On *The Years of My Boyhood*
and Kuo Mo-jo's Later-Day "Self-Reform"
by Wai-Siam HEE

關鍵詞：郭沫若、〈我的童年〉、同性戀愛、自我改造、革命論述、法西斯衝動

Keywords: Kuo Mo-jo, *The Years of my Boyhood*, homosexuality, self-reformation,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ascist impulses

收稿日期：2011年10月28日；通過日期：2013年12月25日。

Received: October 28, 2011; in revised form: December 25, 2013.

* 本文初稿曾於2011年台灣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中首次宣讀，感謝劉人鵬寶貴的講評以及朱偉誠的指正。同年本文修改版也曾受邀於台灣中研院「跨文化中的華文文學文化」學術研討會提呈宣讀，感謝Larissa N. Heinrich、桑梓蘭、彭小妍和楊小濱的指正。本次投稿的改寫也得益於兩位匿名評審的指正，不勝感激。

** 服務單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

通訊地址：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of Chinese, 14, Nanyang Drive, HSS-03-11, Singapore 637332

E-mail: wshee@ntu.edu.sg

摘要

〈我的童年〉詳實記載郭在少童時期的同性戀愛經歷。本文對照不同版本的〈我的童年〉，把同性戀置於郭沫若一系列的自敘傳、詩文和私函進行追蹤。本文發現走向革命後的郭，縱使在日後不斷對自己進行自我改造，也大量修改自己前期的作品。諸多刪改中，唯獨對〈我的童年〉的同性戀描寫只字未刪，這足見郭對同性戀即使從未張揚，但亦不刻意避諱。只字未刪不意味著作者對同性戀毫無愧疚。同性戀記憶對郭而言，始終是他在危難期間發憤而抒懷國家衰敗與革命挫折的徵候。

晚年郭跟少年陳明遠的魚雁往返，不但可被視為〈我的童年〉返老還童的極度含蓄版，亦是他對革命挫折的自我救贖。本文也指出郭一生從「同性戀愛」到「走向革命」的徵候，這些「自我改造」不是學者以為的「自我昇華」，而是郭的「個體神話」邁向「集體神話」的「自我形塑」過程中，同性情慾的性能量，被極端國族主義壓抑變形後，不幸轉化為法西斯衝動的精神能量，朝向極權領袖強大磁場靠攏的結果。那是一種自我理想化的人格賦予愛國主義的形式。

郭的同性戀在「自我改造」多年後，並沒有從根本上被革命論述去除，反而成為他每次面對革命挫折後，從理想化人格撤退到個人化人格的自我想像和自我保護。每當革命的進程面臨險境，他會潛意識地通過書寫，重新召喚被壓抑的同性愛慾望，作為一種對當下精神環境的回應。同性戀成為郭一生吸納與排除革命幻滅的情感力量依據。

Abstract

The Years of my Boyhood records in detail Kuo Mo-jō's adolescent homosexual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compares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Years of*

my Boyhood and tracks his homosexual desires in the context of a series of hi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oetry and personal letter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fter he moved towards revolution, Kuo constantly reformed himself and modified his earlier works on a large scal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revisions, only the descrip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Years of my Boyhood* remains totally unchanged. This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Kuo did not proclaim homosexuality, he did not avoid it either. The fact that not one character of these passages was changed did not indicate that the author felt no regret for his homosexuality. For Kuo, his homosexual memories are a symptom of his rage and emotion in a crisis period of national decline and revolutionary setback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Kuo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e young Chen Mingyuan can not only be regarded as a highly implicit return to *The Years of my Boyhood*, but can also be seen as a type of self-salvation after revolutionary setbacks. This article also indicates the symptoms of Kuo's move from homosexuality to revolution over his whole life. Kuo's "self-reformation" is not a "self-sublimation" as some academics believe, but the "self-fashioning" process of Kuo's "personal myth" as it shifts towards a "collective myth". The sexual energy of homosexual desire was pressured and warped by ultranationalism until it became the spiritual energy of fascist impulses, drawing Kuo into the powerful magnetic field of totalitarian leadership. It was an idealized self in an endowed form of patriotism.

Even after many years of self-reformation, Kuo's homosexuality was never completely removed by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but rather became a means of self-imagination and self-protection every time he faced revolutionary setbacks and subsequently retreated from the idealized character to the personified character. Each time the progress of the revolution was threatened, he would subconsciously call up repressed homosexual desire through his writings as a response to the contemporary spiritual environment. Throughout Kuo's life, homosexuality became the affectionate power with which he absorbed and dispelled the broken dreams of revolution.

一、前言

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漢學家戴偉·羅易(David Tod Roy)在著作《郭沫若：早年歲月》談及郭沫若(以下簡稱「郭」)〈我的童年〉(以下簡稱「我」)，輕描淡寫推論郭的性格具有強烈的同性戀因子：「**最終他成功地克服同性戀，至少把它昇華(sublimating)了。**」(Ku Mo-jo *The Early Years* 29)戴偉·羅易並沒在書中論證郭如何「神奇」地把同性戀「克服」或「昇華」。這種暗中挪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昇華」論述：「**把性本能的驅動力偏離性目標，使之轉向於新目標。**」(*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72)無須任何論證，即能假設任何一個像郭那樣早年經歷過同性戀的人，只要日後的新目標在同性戀本能之外，例如走向革命，或者與異性結婚，甚至只需投身藝術，即能視之為「昇華」。這種「昇華」論述蓄意使同性戀經常在現代中國歷史文獻裡處於「不被看見」的怪圈中，嚴重遮蔽了同性戀作為弱勢主體本身的一種選擇困境，無時無刻處於社會語言機制、道德審查機制和歷史大敘事的強大規訓與「萬眾期盼」中：同性戀總是被強制進行萬轉千回的「自我昇華」。

從中國到漢學界有關郭的主流論述，經常對郭的同性戀經驗採取迴避的策略。即使略提，不外彰顯兩種敘述模式。其一多半避開評價，在總體上肯定郭的「功大於過」，這尤其為大陸主流史家所擅長，即使有者涉及評價，也認為那不是「龍陽之好」。¹；其二是挪用中國正統歷史自古以來敘述男色的歷史敘事—「男寵亂政」論述：²中國每次的改朝換代幾乎均是「世衰道微」的結果，在妖魔化郭作為中共文化弄臣

1 此語出自中國社科院知名學者李潔非，他還算是近年比較願意提及郭的同性戀經歷的學者，不過還是把郭的同性戀經歷解讀為「唯因年當少時，懵然無知，泛情泛愛，錯把一腔激情加於同性」。(《典型文案》76)

2 朱偉誠曾就中國古典「男寵亂政」論述，深入分析(〈詭異的鏡像：透過馬婁的《愛德華二世》來看中國古典男色的「君臣篇」 239-278)。

的同時，也順道暗中把同性戀進行污名化，這類從大陸到境外的主流敘事模式，目的不外在於全盤否定郭的歷史貢獻，此類論述可追溯到1950年代史劍在香港的著書《郭沫若批判》（詳後）。因此，歷來無論是在肯定或否定郭的歷史論述裡，郭的同性戀愛皆顯得無容身之地。

本文題旨不會僅滿足於指證郭的同性戀愛，畢竟郭生前坦盪盪以自敘傳方式呈現的同性情慾，乍看之下已無需好事者去考證；然而，本文更要揭示這些自敘傳或歷史論述的權力機制，³如何對郭的同性情慾的自我暴露，千方百計進行遮蔽和改寫的同時，也一同參與了郭對自身革命系譜的「自我改造」。本文所謂的「自我改造」，指涉一種「將改造政治和社會的要求，轉成個人智識和德行上的自我要求。」（楊貞德 7）這種思維方式，常見於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各自時代的政治和社會時，都會傾向於以「自我改造」作為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而不傾向於相信和堅持經由外在於人心的法律、制度所能帶動而來的改造。他們以為改變文化和思想的辦法在於改變個人的主張與態度，其根本又在於從個人著手，以人心為訴求的對象，並以自我改造作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改變途徑。（楊貞德 6-7）縱然現代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在1920年代初期以降，逐漸從自我改造，轉向強調個人經由團體和組織，向外改造客觀制度和結構的演變。不過這個自我改造的取徑過程，不過是被無產階級的革命論述替換的過程。發展到1949年後，中國左派知識分子繼續以革命的名義，進行從思想到靈魂

3 本文是從郭「有血有肉」的小敘述，去看現代中國國族主義歷史「敵友分明」的大敘述。中國主流話語經常預設「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史」之間有一些清晰可辨的思路，互相貫穿中國國族主義的歷史，任何逃脫這些思路的觀點即被批評為沒有「把握」歷史性環節的分寸。這些批評忽視這些思路的霸權邏輯，一早就已被中國國族主義歷史的大敘述所規訓。當代中國大陸所謂的「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史」，更多是作為中共體制的學科（這即是本文所謂的「歷史論述的權力機制」之一），一直效命於中國國族主義歷史「敵友分明」的大敘述，反而嚴重遮蔽了中國作家在作品中再現的小敘述，郭沫若的同性情慾個案被「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史」遮蔽，僅是冰山一角。

的徹底改造。這樣的自我改造帶有自我淨化的意味，因為它增強了一份極端理想的道德觀：貞潔無邪的身體和心靈的打造。在中國大陸內部自我淨化的革命語境裡，又在西方「昇華」論述的權力機制影響下，中國大陸主流史家論述，向來把革命歷史和身體慾望本能的關係處理得無足輕重，甚至兩相對立，彷彿前者勢必凌駕或克服後者。面對此類史家論述傾向，本文採取逆向操作的反詰方式：沒有郭早期的同性戀經驗，何來他日後的革命？人們是否有必要坦然接受和直面郭的同性戀經歷，不然一切簡單肯定或否定郭的革命論述均是無效的？

而面對後一種從大陸到境外更為普遍對待郭的「男寵亂政」論述：把國勢衰亂，簡單歸咎於幾個弄臣的歷史因果敘事模式，麻煩的不僅是這個負面政治道德框架的束縛，而是這個政治道德觀所攜帶的把同性情慾等同「亡國亡種」的隱性恐同效應，⁴它籠罩着中國史書的敘述機制，向後世無窮輻射著倫理道德的末日警訊。郭被譏為是中共「文化弄臣一倡優蓄之」（丁東編 295，282），這些嘲弄深深帶有班固《漢書·佞幸傳》以降所謂的「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強」的「男寵亂政」焦慮。（2768）這些「亡國亡種」的政治道德效應，依舊是今日各地華人同志們在重覆應對本土國族主義者或任何當權者的類似強大責難，⁵所差以攤開的東亞歷史論述資本。⁶

4 此觀點出自〈朱偉誠〈詭異的鏡像：透過馬婁的《愛德華二世》來看中國古典男色的「君臣篇」〉 245）。

5 即使在一座被譽為全球最友善對待華人同志的台灣，對同志權益持有反對立場的本土政客們，依舊可以聲勢凌人吐出「同志亡國論」，恐嚇和指責那些同情同志的立委和群眾們，2003年民進黨立委侯水盛在立法院的發言即是一例。雖然他後來在台灣輿論和民進黨團的施壓下，不太情願地公開向同志們道歉，但堅持認為是媒體歪曲他的發言，而且辯稱他「純粹是以醫學角度討論此事，一切都是誤解。」（〈同志亡國論侯水盛道歉〉台灣《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6 相對於豐富的中國古典到現代的男色歷史個案，華人同志一般更傾向於動輒攤開歐美同志的人權論述，作為回應本土當權者對他們「亡國亡種」的指責，而往往這些回應不是最終「雞同鴨講」，就是適得其反。因為這些來自歐美的同志平權歷史論述，反而更強化了這些本土當權者對本土國族政治道德信仰的捍衛，以及對歐美帝國同

面對台灣本土主流身份認同和大陸左派的國族主義長期保持斷裂的政治生態，本文在台灣首先勢必迎來質疑：郭沫若這三個字究竟對台灣的歷史知識論述還有何「用途」可言？如果他不是更加劇了台灣本土主流身份認同對郭作為大陸左派官方喉舌的偏見和敵視？首先本文要提醒，倘若大家均認同國民黨歷史亦是台灣歷史重要的一環，郭不是跟台灣歷史無關，郭的政治革命生涯起自1920年代的國民黨，還一度是蔣介石北伐的得力助手（詳後）。本文梳理郭在革命前後的活動，無論是他的政治行動或同性戀活動，不但足以讓今人管窺大陸左派的國族主義革命與情慾藏在歷史動力的幽微處，有待挖掘和釐清，不是台灣本土主流身份認同論述一向不以為然的鐵板一塊，而且這項研究亦有助於讓台灣同志平權論述多了一項可以挪用或探討的東亞現代傳統歷史論述資本，不至於無論正面或反面的性別論述教材，皆需全盤借貨自歐美的同志歷史論述。況且，郭在台灣並非乏人問津，例如21世紀初劉紀蕙從法西斯式的組織衝動，分析郭與創造社的前衛精神和烏托邦想像（《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 159-231）；近年亦有蔡玫姿研究郭的跨國體驗與留日小說（《親臨陌異地：五四作家跨國經驗形構的文學現象》 37-150）。

劉紀蕙曾從納粹政權的法西斯特質與集體妄想症，剖析郭與創造社成員擺盪於頹廢和革命之間的論述。她引述那些研究希特勒納粹文化的學者觀點（Hewitt 1-37），認為希特勒的法西斯性格的妄想特質與被壓抑的同性情慾有所關聯，並觀察到郭沫若的新詩也含有法西斯之內在衝動的妄想特質（劉紀蕙 285，219）；不過並沒有注意到郭和希特勒一樣，大半生壓抑了對同性的情慾。法西斯特質是一種「極端國族

志平權歷史論述的排斥。無論是台灣當下的「統派同志」或「獨派同志」，均要日漸承受台灣本土國族主義的詢喚，郭的同性情慾與中國國族主義交手的歷史個案，足以提供一個重新理解東亞同志發聲和國族主義之間糾葛的歷史線索。有關台灣「統派同志」或「獨派同志」之說，參見（朱偉誠〈詭異的鏡像：透過馬婁的《愛德華二世》來看中國古典男色的「君臣篇」〉 239-242）。

主義」(ultranationalism)的意識形態和實踐形式(Passmore 25)。⁷此極端國族主義把對國族的絕對效忠，凌駕於任何的一切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之上。筆者認為郭後期對極端國族主義的歌頌和實踐，其中所顯露的法西斯性格的妄想特質，未嘗不是跟前期被壓抑的同性情慾有所關聯(詳後)。⁸

職是之故，本文認為倘若郭的同性情慾被「昇華」的說法足以言之成理，那不過是周蕾(Rey Chow)所謂的一些「無處可去的「昇華」能量被替換，以被扭曲的形式成為法西斯主義」(The Fascist Longings in Our Midst 18)。周蕾把「法西斯衝動」詮釋為「更多是一種對於透明和『理想化形象』(idealized image)的渴望、認同與臣服。」(32)郭沫若前期主張個人主義的藝術表達，後期卻批判和摒棄前期的個人主義，完全投向集體話語的極端國族主義。這個極端的改變過程，顯然跟有一個理想化形象一直在詢喚他、馴服他有關；此理想化形象包含絕對的國家主體、新秩序與一致性。它召喚子民以具體形式壓抑個體慾望，集結所有個體動力，與集體結合為統一整體，將所有慾望「昇華」轉而投注於集體妄想的理想化形象，並以集體共有的這些超越理念作為代替物，這正是本文所謂的「法西斯的集結衝動」(劉紀蕙 283-302)。

1920年代中旬以後郭投身革命，先後分別成為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和毛澤東的共產黨專政的喉舌。研究中國歷史的易勞逸(Lloyd E. Eastman)發現國共兩黨高層均使用法西斯暴力，煽動全民的國族主義，操控人民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和對國家的絕對效忠(81-82)。三十年代中國，早已有識者指出：「法西斯主義是倒轉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

7 更多有關法西斯的完整定義，參閱同書頁31。

8 本文當然不是說同性戀愛會導致法西斯特質，這兩者之間沒有因果關係。本文僅是指出在郭的個案上，那些被壓抑的同性情慾，在面對「社會競爭—壓迫」的諸形態下，郭的現代自我形塑「個人化」人格面臨失敗營造的局面(詳後)，到最後是如何不幸被他轉化為法西斯衝動。這些發展置於郭雙重交叉的文學生命和政治生命裡，有一條隱而不顯的脈絡可尋。

是倒轉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左翼，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右翼」(吳友三 11)，郭先後服務於國共兩黨，最能深諳其中三昧。雖然在政治學或者現代中國革命歷史研究的脈絡上，「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理念上是兩種對立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然而也有很多研究從比較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各國的發展結果，從而顯示出「兩者有許多相似處。它們都主張一黨專政以黨治國、以暴力手段維護政權、絕對禁止個人自由主義及極權統治等」(馮啟宏 33-34)。況且這兩者的藝術均有共同特色，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法西斯藝術和共產藝術「反映在極權主義的政權下，都普遍表現好大喜功，盲從與崇拜英雄，藝術作品都負有把領袖與教條奉為永世(imortalizing)的重任。」(91)郭從中期開始那些把「自然」給完全神聖化的新詩集《女神》，一直發展到後期那些歌頌毛澤東、鬥爭和極端國族主義的作品，都與法西斯主義的三個核心概念：戰爭、自然與國族撇清不了關係(Neocleous xi.)。本文以法西斯的衝動來分析郭中後期的轉變，其理論的適用性和合理性正是建立在郭中後期那些歌功頌德的文本，以及先後都以極端國族主義，服務於國共兩黨的複雜經驗。⁹這種遊走於國共兩黨意識形態對立的複雜經驗，是我們清理郭的法西斯特質的重要前提。

本文認為正是郭後半生的同性情慾，日漸被五四的國族主義、國民政府和中共政府的極端國族主義壓抑下來，在「社會競爭一壓迫」的多重決定(over-determine)下(詳後)，導致晚期的他傾向展示法西斯式的集結衝動歌頌毛澤東以及發出「焚書」宣言。乍看之下，郭的弄臣本色似乎不幸成為古典「男寵亂政」論述的現代版，但是本文認為：不是同性情慾導致郭成為文化弄臣，而是他被極端國族主義壓抑的同性情

9 這也當然不能被簡單理解為郭即是一位徹底的法西斯主義主義者，這本來就不在郭有意識在自敘傳建構的自我形塑裡。法西斯主義不能被等同法西斯衝動。前者是一套有意識擁抱和實踐的政治信仰；後者是潛意識驅使向國家領袖膜拜的集體慾望。

慾和自我想像，在中國革命政治地形圖的諸種歷史動力和「社會競爭—壓迫」的多重決定下，推動他走向文化弄臣的末路。

〈我〉詳實記載郭在少童時期的同性戀愛經歷。雖然郭的寫作意圖是要從「通過自己看出一個時代」(郭沫若〈少年時代[序]〉 1)，但郭按捺不住字裡行間的浪漫主義餘緒，大大溢出了他為自己寫作所設下的規範和意圖，反而此書意外見證了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一個憤世嫉俗的美少年花樣年華的流逝，與一去不復返。作家的童年在很多五四作家例如冰心〈我的童年〉和張天翼〈我的幼年生活〉筆下，經常顯得純真無邪。¹⁰但郭的〈我〉卻意外超越同代人回憶童年的「純情」模式。〈我〉充滿了清末民初個人意識的轉型時代印記和欲望記憶：作者參加學潮與數次被勒令退學、新學與舊學的糾葛、學堂的「偷營」(男生之間的肉體關係)、「奮飛」(「吃酒戲耍」的俚稱)、「遊蕩」(與同性交往冶遊)，以及與男生的初戀。

晚年郭暗中和「同性少年知己」陳明遠保持長達十多年的魚雁往返和私下見面，亦是他少童時期「奮飛」和「遊蕩」以另一種「個人化」的自我想像延續，整個避人耳目的交往過程顯得極度的含蓄、隱密和壓抑。不少學者以為郭的同性戀經驗只是過渡階段，相當短暫(Kang 79-80)，忽略分析晚年郭和陳明遠的親密交往。考察晚年期間郭和陳明遠的交往，不僅可以管窺郭後期的同性戀如何被壓抑變形，亦有助於了解晚年表面「風光」的他，另一面不為人所知的悲涼心境，以及「自我改造」多年後，唯一頑固殘餘下來的同性愛情結，作為一種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最後抵抗。

本文通過細讀〈我〉在不同時期的增刪，考察郭的同性戀愛和自我想像，如何被他通過自敘傳文體，進行論者所謂的一種現代的「自我形

10 冰心的〈我的童年〉和張天翼的〈我的幼年生活〉，收於(新蕾出版社編輯部《我的童年》 87-110)。郭〈我〉被易名成〈沫若童年〉，亦收編此集子裡，不過原文所有涉及「性的覺醒」和相關同性戀愛的描寫，都被編輯刪掉。

塑」(modern self-fashioning)(Holden 17)。最普遍能形塑「**個體敘事**」(personal narratives)的方式之一即是自敘傳(Crossley 68)。當代敘事心理學(narrative psychology)學者麥克亞當斯(Dan P. McAdams)即是通過對自敘傳的研究，強調自我與認同在個體間性對話(interpersonal dialogue)的重要性，亦揭示了個體神話(personal myth)總是在充滿衝突的「自我想像」中完成「自我形塑」。麥克亞當斯認為我們的人生故事可能具有一個或多個的主導性自我想像，顯現兩個中心和分歧的自我想像，這似乎相對來說是常態。自我想像由個人化和理想化的概念組成，每個人的人生故事，有意識或潛意識總是把自己的主要人格進行「形塑」(fashions)。倘若這種人格功能在自我的想像中只屬於個人，那就是「個人化」的人格。倘若人格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呈現誇大和單向度的形式，這即是「理想化」的人格(McAdams 122)。

麥克亞當斯指出的這兩種充滿分歧的自我想像，即「個人化」和「理想化」的人格，貫穿郭自我想像的一生。同性戀經驗在郭的書寫中，從早期的自我暴露到晚期的自我救贖，均顯示出「個人化」的自我想像。而郭「理想化」的自我想像則主要展示在五四名作〈鳳凰涅槃〉和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焚書宣言。不同僅在於〈鳳凰涅槃〉的自我影像是自我膨脹的個體神話，而焚書宣言則是集體神話的結果。¹¹郭寫出五四名作〈鳳凰涅槃〉，藉神話意象「鳳凰」集香木自焚，以比喻自我的「再生」，這是他理想化的人格功能在發揮作用。恰好是麥克亞當斯所：「**我們不是在神話中「發現」自己，而是「創造」自己。**」(13)當時郭與同仁創辦的文學社名目恰好是「創造社」，起初希望通過藝術來「自我創造」，亮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這是他的「自我創造」時期。後

11 「個人化」人格和「理想化」人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矛盾和對峙的，自我想像總在這兩個中心之間，同時運作和拉扯，導致超過一個的主導性自我想像，即所謂「分裂型人格」。當個體的主導性自我想像在不同時間點上的重疊和強化，則形成「個體神話」。當多個的主導性自我想像，在社會場域中被統一成單向度的身份認同，這即構成了「集體神話」。

來卻希冀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與政治主張來「改造自我」，這正是「自我改造」的後期。

從「自我創造」漸漸發展到「自我改造」的過度時期當中，這種發展是以「自我轉向」的方式行進。¹²「自我轉向」乃基於某種自我教育和自我更新，強調「轉折」性的覺悟、自信、飽滿和充滿可能性，至少在四十年代之前的郭是如此。¹³他一如其他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相信知識和道德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知識和道德的培養是一體的兩面，並傾向於將知識問題理解為道德(或倫理)問題，傾向於將改革政治轉換為個人的自我改造**」(楊貞德 21-22)。四十年代後，尤其是當毛澤東陸續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郭作為中共文化的班頭，其「自我改造」逐漸以一種持續的、不斷自我檢討過程展開，凸顯缺陷與不斷自我否定，¹⁴漸漸發展到晚期形成極端國族主義的「法西斯狂熱」：把自我想像的理想化人格，投射和接軌到那個透

12 「自我創造」伴隨著「個體神話」的進行，而「自我改造」則是「集體神話」的過程。從「自我創造」到「自我改造」，乃是「理想化」人格被發展到極致的過程，隨之伴隨的是「個人化」人格的倒退。

13 感謝匿名評審提供此見。

14 感謝匿名評審提供此見。誠如評審指出，郭沫若在重慶時期被中共指定為魯迅繼承人，這其實是建立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換句話說，他們是在非黨員的「民主人士」的前提下被賦予文壇領袖地位。真正的中共文化班頭應是周揚一類經歷過延安整風的黨員作家、幹部。因此，在「思想改造」方面，郭沫若的經歷並不典型，他是被供起來的，真正的作家「思想改造」是延續了延安整風的經驗，除了強調自我檢討外，更注重「與群眾結合」，在基層革命工作中鍛煉。本文正好認為就是因為郭的「自我改造」放在中共革命脈絡底下，並不「典型」，因此更印證了郭的作品和思想，並不盡然是「典型」的中共文本，因此更不能完全把郭置於共產主義在中國革命史的「典型」框架來省思，而無視於其他潛在因素例如「法西斯的集結衝動」對郭中後期作品與思想的滲透。這也是中國大陸研究郭的學者，從過去至今幾乎不關注的層面。由於長期受限於中國現代國族主義歷史「敵友分明」的大敘述，這類大敘述經常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二元對立的比較和建構，並指控國民黨人士為法西斯份子。因此過去至今的中國人多半在情感上，可能會很難接受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在極端國族主義邏輯上的類同，然而今天在拋開『敵友分明』的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敘述上，我們必須正視這兩者之間盤根交錯著極端國族主義的邏輯。

明和理想化的國家主體；作為國家意志的毛澤東，正是郭歌頌和宣揚的理想化形象。從「自我創造」漸漸經歷「自我轉向」，發展到日後的「自我改造」，從個人意識的「個體神話」邁向「集體神話」，這正是郭現代的「自我形塑」之心路歷程。

郭的自敘傳總共一百二十多萬字，於1928年開始創作，終於1948年，記錄了他從1歲到57歲的生命歷程，也是晚清轉向中華民國的歷史進程時期。《我的幼年》(現名《我的童年》)是他的第一本自敘傳。〈我〉正是寫於「自我轉向」的過度期。郭在這段流亡日本的過程裡，通過發現兒童「性的覺醒」而重述自己的「同性戀愛」。¹⁵中文「同性愛」一詞是來自二十世紀初的日本，中國人從此詞發展成「同性戀愛」和「同性戀」之說(Sang 102-103)。郭在〈我〉選用「同性戀愛」一詞，跟當時流亡日本受到這些用詞的啟發，不無關係。

〈我〉記錄郭從1歲到17歲在四川成長和學習的歲月。以今天依照西學教育把「童年」規限在12歲或以下的標準來看，¹⁶〈我〉顯然逾越今人對「童年」的規限認知。它不僅記錄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其實也包含了他對年少輕狂時光的追憶。不過這一切卻是以「童年」或「幼年」命名之，企圖貫徹了自己事後對那「無意識的時代」的自我理解和闡釋(郭沫若〈少年時代[序]〉2)。

〈我〉於1929年甫出版，即被國民黨政府查禁，也昭示了日後將要

15 柄谷行人認為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文學發現了兒童(《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111-112)。

16 中國古代兒童的年齡規限比西人來得模糊：「中國古代有『兒』、『嬰』、『孺』、『幼』、『童』、『蒙』等概念，但都沒有準確的年齡劃分」(劉詠聰 1)。從語言和文化上考慮，中文的「兒童」、「孩子」、「子」、「童」或「幼」，其涵義除了指的是狹義年齡，也代表一種「社會地位」或角色，亦指的是「抽象意涵」的兒童，近乎「童心稚情」的意思(熊秉真 24)；即使西方中世紀藝術一直發展到十二世紀，還沒出現嘗試描繪「童年」的肖像或不知道它的存在，不是因為這些藝術家不稱職或無能，更可能是在中世紀世界裡，「童年」並沒有位置，「童年」在西方被發現是十二世紀以後的事(Ariès 33-49)。

面臨不斷刪改和易名的命運。¹⁷郭對〈我〉的刪改，可分成前後期因素，前期因素是受制於國民黨政府對此書的刪剪批示，後期因素則是作者在不同時期主動的自行刪改。從1929年至1940年對此書的刪改，多半是受制於國府審查機制的前期因素；而後期從1947年至新中國建國後的刪改，則是作者對政治環境變異的反應。

〈我〉於後期主要進行兩次重要增刪，分別是1947年版和1958年版。¹⁸單看書名的更換，從《我的幼年》到《童年時代》，再發展到《少年時代》，到最後集大成《沫若自傳》和《沫若文集》，顯示的不只是一個五四作家的誕生，而是一個革命家如何在不同年代通過出版機制「自我形塑」自身的現代性工程。

二、「同性戀愛」：偷營、遊蕩和奮飛

由於清末教育處在轉型的西學東漸時代，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傳統廟學制的崩潰，不少應舉不果的成年人需要重新適應由張之洞在「中體西用」概念下主導的癸卯學制¹⁹—從小學堂讀起。1906年，郭在15歲才開始小學堂生涯，²⁰當時卻已算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

17 此書有數種版本。不但內容出現一些修動，書名也幾番更換。這分別在建國前有最早的《我的幼年》(1929年光華書局版和1931年文藝書局版)、《幼年時代》(1933年光華書局刪剪版)、《童年時代》(1940年合眾書店版)、《我的童年》(1947年海燕書店版)以及1949年後的《我的童年》(1958年人民文學版)。這是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版本，有三個版本沒出現在上海圖書館編的《郭沫若著譯分類書目》裡。例如1931年文藝書局版、1940年合眾書店刪剪版和1947年的海燕書店版。該書目參見(上海圖書館編 161)。

18 1947年郭作為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地位，穩如磐石，作者把〈我〉和其他三篇自敘傳〈反正前後〉、〈黑貓〉和〈初出夔門〉合為一冊〈少年時代〉，作為《沫若自傳》第一卷出版，作者為〈少年時代〉添寫一篇〈序〉，並對〈我〉作了增刪。1958年郭正式成為中共黨員，當作者要把〈我〉收入《沫若文集》，再次對〈我〉做了修訂，以後至今的〈我〉，主要依據的是此版本。

19 具體論述參閱(黃士嘉 383-400)。

20 戴偉·羅易稱郭「十三歲」才進讀小學堂，此年齡計法有誤(Kuo Mo-jo *The Early Years* 23)。

了，班上三十歲上下的成年人占過半數以上(郭沫若〈我的童年〉 62-63)。²¹雖然如此，郭顯然比一般少年早熟，自稱還沒上小學堂，就在蒙學堂階段，經歷了「性的覺醒」(〈我的童年〉 46)。七、八歲之際堂嫂那「**粉紅的柔嫩的手**」(47)引發他想觸摸的念頭，其實整個過程，連郭本身也奇怪，他當時並不敢上前實現這念頭，但卻在執寫〈我〉的時候，把它視為是性覺醒的最初症兆。²²

這一則「性的覺醒」，其實是以「戀物癖」(fetishism)作為症兆。十九世紀末的性學家理查·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把「戀物癖」定義為「**一組對女性特定部位或衣物的強烈慾望**」(143)，當女人的手、腳和頭髮主導了男性的戀物對象，女性氣質和女性身上存有的其他性價值均會被戀物者化整為零，最後戀物行為本身的怪異操演，替代了交媾，形成一種不能公開的性慾望和慾望對象(147)。堂嫂那局部的「**粉紅的柔嫩的手**」正是最初作為引發郭「戀物癖」的慾望對象。因此，循著「戀物癖」漸漸越演越烈，當郭十一歲之際，他終於「**把竹竿當成了自己的愛人**」(郭沫若〈我的童年〉 48)，他平日做猿升式的攀援運動之際，喜歡用兩腳把竹竿緊緊地夾著，「**感覺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48)。因竹竿過高過大，後來又以「**枇杷樹叉**」作為取代。這些如癡如醉借助「竹竿」和「**枇杷樹叉**」摩擦下體的自慰行為，再配合著他大哥從東洋帶回來的「淫書」例如《西廂》，讓郭的「**指頭兒自然又忙碌起來**」(49)。

真正讓郭感覺到最初對一個人完整的愛慕，是小學堂的那段時期，他結識同齡同學吳尚之。他倆最初的見面就是「**一見傾心**」(68)，「**比兄弟骨肉間的感情還要親密**」(67)，幾乎天天晚上都要「**奮飛**」。「**奮飛**」是他倆之間在學堂裡的一個暗語，意謂要結伴從學堂偷跑出去城裡遊玩與喝酒。每次「**奮飛**」結束，吳尚之要回家，郭必定送一程。

21 以下對〈我的童年〉引文，如無特別註明年代版本，均出自1958年版本。

22 〈我〉刻畫兩段異性情緣，均在近親血緣的「亂倫」範圍內，值得注意。

吳尚之往往又倒頭來送郭，兩小「送來送去的，總要送好幾次。」(69)不見面的時候：「彼此感覺著痛苦，彼此都寫起信來。等第二天見面的時候，你拿給我看，我拿給你看。」(69)讀者可能會以為這只是兩小無猜的情感，但作者很快對這種情感有了清楚的認識：「這樣的情景，我們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種同性戀愛的心理一樣，但是我們的相愛確是比戀愛更嚴肅。」(69)由於周遭同學的閒言閒語，一些小同鄉以「醜惡的關係」來懷疑他倆的交往，讓他倆頗感壓力和不自在，似乎清末的同性愛風氣已成敏感話題(71)。

郭從小自認漂亮：「我有一個豐滿而白皙的面孔，因為發育好，身體很健康的原故，兩頰上暈著紅潮。」(72)平時貪耍，偏偏第一學期的考試成績得了第一名，引發了老學生們的猜忌與不滿，紛紛懷疑郭是因為俊美，與男教師私通，遂得第一名。他們一大群鬧到校長室，結果郭從第一名降到第三名。²³郭在另一篇文章〈我的學生時代〉重寫此事，認為此事對於他「一生是第一個轉扭點，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我恨之深深，我內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學生時代》4)郭之後一系列在學堂率領學生向校方請命的叛逆舉止，在在要證明自己不僅天生麗質，也具備領導才幹。郭何嘗不自知自身的自敘是在與詭譎的中國歷史敘述權力機制周旋。《漢書》以降的史書建構一套男寵「以色稱媚」的正典歷史敘述力量，比起《史記》客觀肯定男寵「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的敘述來得更有蠱惑力，它如影相隨於中國每一代人的文化思維(司馬遷 5168)。郭的「同性戀愛」敘述一開始即陷入中國史書敘述的夢魘。

郭「仿效學校的同性戀潮流」(Lee 180)。小學堂男生宿舍經常發生幾乎人人自危的「偷營」事件，即「在夜半深更乘著別人熟睡了要想去褻瀆他的一種勾當。」(〈我的童年〉69-70)郭在夜裡聽到男生計謀要

23 根據初版降到第八名(郭沫若《我的幼年》126)。可見郭在不同階段修改〈我〉，對細節都很著重。

去偷尚之的營，趕忙托同學提醒尚之留意。不知是傳話的人傳錯了，還是尚之聽錯了，他以為是郭要去褻瀆他，氣得尚之有兩三個禮拜不跟郭談話。由始至終，他倆似乎處於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結拜成為兄弟，以「友愛」過渡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

後來十九歲，郭在成都讀書，偶遇吳尚之，百感交集，作詩〈寄吳君尚之〉二首：「**交成莫逆淚痕多……心如磨蟻總無何……翻雲覆雨喻交遊……**」(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 19-20)大陸學者註釋此詩，普遍認為「詩中表達了作者對誠摯友誼的衷心珍惜。」(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 19)但如果他倆只是「友誼」，何以詩中還會出現「淚痕多」、「心如磨蟻」和「翻雲覆雨」的複雜意象？中國古代文獻例如十七世紀的〈斷袖篇〉正是以「翻雲覆雨」來形容男同性戀行為(吳下阿蒙編 1060)。²⁴而且郭以「莫逆」來比喻同性關係，不能只作表面上的字義詮釋，還須要注意作者拈用此詞的頻率和上下文(context)。一個有力的證據是作者在〈我〉描寫他與一位姓汪的少年(以下簡稱「汪少年」，容後再敘)的同性相戀，同樣以「**莫逆之交**」形容彼此強烈的情感，因此「莫逆」在郭遣詞用句的上下文裡，其含義恐怕不能簡單和「友誼」等同(111)。

少年郭的性幻想經常處於「意淫」狀態，自瀆的行為差不多一天兩三次。曾經酒後幾分醉意，被朋友帶進妓院，終究害怕，掉頭跑出來。郭不但俊美，而且還是小學堂裏代表學生跟校方爭取權益的小領袖，很受學生愛戴。有一個面容姣好的男生曾在暗處主動握緊他的手，以示愛慕。有一位姓章的男同學，把郭「**當成女性一樣**」來愛慕(〈我的童年〉 92)。小學堂時期的郭隱約對同性愛作了兩種區分，一種是嚴肅的同性相愛，例如他和吳尚之兩情相悅謂之的精神戀愛；另一種是不嚴肅的同性戀行為，把欲望對像當作女孩般威逼脅迫的淫

24 高羅佩(Gulik)在《中國古代房內考》亦認為「翻雲覆雨」乃指男同性戀行為(40)。

愛，例如宿舍普遍發生的偷營事件。

郭上了中學，對同性戀的上述區分開始模糊，柏拉圖的精神戀愛顯然無法再滿足他，他開始通過游蕩活動泄欲，例如帶相公去旅店開房。他也跟城內一群中上等人家的「遊蕩」子弟，一起搞了一個「轉轉會」，即是定期大夥兒輪流請吃酒宴和打牌。

當時被譽為「轉轉會內之花」的汪少年，一班人都向他獻媚誘惑，汪少年唯獨和郭要好，兩人每天見面。汪少年漸漸和其他朋友疏離，喜歡單獨約郭出來遊玩，專一和他要好。兩人形影不離，飽受流言中傷。汪少年對郭說：「**我和你好。他們在說我的閒話，但是我不怕的。我們一個是心甘，一個是情願**」(103)汪少年不像之前的吳尚之膽小怕事，這也使到郭和他的關係並不止於精神戀愛。有一晚郭在「轉轉會」裏喝酒鬧事，獨自一人離開，氣惱汪少年怎麼沒跟著來，只好一人投宿客棧。半夜被吻醒了，汪少年把甜蜜的紅甘蔗涼汁渡入他的口中。郭緊緊抱住他說：「**啊，我真愛你呀！**」(106)然後倆人在客棧睡了一夜。他倆的親密關係，郭也不畏言承認：「**我在這兒才感著真正的初戀了，但是對於男性的初戀。**」(102)與汪少年的同性戀愛，對郭一生可謂刻骨銘心，1915年郭留學日本，還以一首〈蔗紅詞〉，遙寄他對汪少年的情意與思念：

紅甘蔗，蔗甘紅，水萬重兮山萬重。憶昔醉朦朧，旅邸淒涼一枕空。卿來端的似飛鴻，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頭從，才將命脈兩相通。難忘枕畔語從容，從今愛我比前濃。紅甘蔗，蔗甘紅，水萬重兮山萬重(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 109)。

此詩出現的「**乳我蔗汁口之中**」和「**旅邸**」，顯然是郭藉詩，重新追憶和回味他和汪少年當年在「**旅邸**」的纏綿之夜。²⁵現今一般大陸學者

25 陳明遠轉述田漢的話，稱此詩是「寫給一個少年男子『相公』的同性戀詩」(陳明遠〈湖

無視此詞在〈我〉的上下文，強硬把它解釋為「男女之間真摯的愛情」（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 109）。

如果郭和汪少年的關係僅是一場懵懵懂懂的初戀，它可能跟中國現代文學史建立不了關係。但郭在文中告訴讀者，跟汪少年「初戀」，也是這個五四作家開始對近現代文學產生興趣的時候。由於他和汪少年相戀，「轉轉會」的遊蕩兒們都成了他的情敵，他自然不能不和他們疏遠。一和他們疏遠，生活重心也往其他方面發展，而文學則是郭在那時努力正要發展的新方向。郭還說是汪少年救了他。這裡主要是指他倆的初戀，使到郭不再「消費於酒，消費於遊蕩」（郭沫若〈我的童年〉 111），即是說自從和汪少年相愛，郭不再花錢進行同性戀行為，例如參加「轉轉會」，以及帶相公去旅店開房。有一次郭喝醉了，在煙館門前遇著一個彼此相識的相公，郭要引著那位相公去旅館開房，但卻被汪少年當場從中作梗不果，以致於那名相公最後怪責汪少年吃醋。從汪少年的吃醋看來，他對郭的愛意表現與異性戀情侶無異。

汪少年意外地把郭引向近現代文學的志業，他可能萬萬沒想到，這也是他倆的同性愛走向末路的開始。中國那時也處在西學東漸最蓬勃的時期之一，林紓譯介的大量西方小說、梁啟超的《清議報》和他翻譯的《經國美談》等等也一併進入郭的視野。其中林紓等人譯介的英國作家哈葛德（Haggard）的通俗小說《迦茵小傳》，是郭最早讀到的西洋小說。在閱讀過程裏，郭浪漫地把自己想像成是小說裏的男主角亨利，從古塔的頂上墜下，他的愛人迦茵張著兩手去接受著他。有時郭會把迦茵的位置由汪少年替換上去，「但總覺得不自然」（〈我的童年〉 113）。

少年郭在主觀閱讀過程中出現的想像錯位，很值得研究。首先，由此可見一斑，郭在潛意識也真的把汪少年視為自己的愛人，不然也不會在閱讀過程中嘗試以汪少年來取代想像的迦茵。汪少年對郭十分

畔散步談郭沫若〉 250）。其實汪少年不是『相公』，而且根據〈我〉的記載，旅館那夜兩人的宿費，隔天早上醒來，還是汪少年買單（郭沫若〈我的童年〉 106）。

懇切，郭如此形容這種微妙的感覺「**有時候就像我的一位姐姐一樣。**」(103)郭形容汪少年的「**面貌很端麗**」(102)，原著在伽茵出場時，刻畫伽茵的相貌也接近如此“beauty of her face and form”(Haggard 5)，林紓譯成「**容姿既媚**」(哈葛德 6)。而且兩人教育程度不高的背景還挺相似，汪少年的父親早逝，失了學。郭經產引以為憾：「**假使他是在讀書，而且和我是同學同班的時候，那真是再圓滿也沒有了。**」(〈我的童年〉 103)迦茵在小說裡也是出身低下，不知父親是誰，母親早亡，受教育程度不高：「**迦茵所學遠不如人**」(哈葛德 8)；而亨利則是男爵之子，社會地位比較高，這和郭從小在地主家族長大的背景頗相似。迦茵敢做敢為，不顧眾人非議，向愛人大膽示愛，以身相許，未婚先孕；這和汪少年無顧世俗眼光和阻難，堅持跟郭展開親密的同性交往，兩人在性格刻畫上可說是異曲同工。縱然如此，郭總覺得自己和汪少年的同性相愛，始終不如亨利和伽茵的異性戀來得自然。郭對此的夫子自道：「**因為他(筆者按：指的是汪少年)也是男子，很像用不著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護他的一樣。**」(〈我的童年〉 113)

於1949年從大陸移居香港的前上海《和平日報》總編輯史劍，在其五十年代著作《郭沫若批判》，²⁶論及〈我〉的男色書寫，言之鑿鑿指稱：

西洋小說對他的變態性心理及糾正大約有相當作用，郭沫若在自傳中對自己變態性慾的敘述，從接觸西洋小說之後就顯著地減少了，他在嘉定中學的第二學期開始時，已經「戒絕」了男色的愛好，而轉移興趣到女人身上(29)。

郭是否後來已「戒絕」男色愛好？論者沒拿出充分證據。²⁷畢竟這

26 史劍原名馬彬，李歐梵認為這是一本右翼分子對郭批判的最具代表性著作(Lee 323)。

27 反而有證據顯示郭的高等中學堂歲月，還是其同性愛活動的高峯期之一，當時的同學曾琦等人日後還以此由，拒絕讓郭在五卅時期申請成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不是一本學術著作，此說邏輯卻影響了戴偉·羅易在其學術著作《郭沫若：早年歲月》對郭同性戀的「昇華」論術判斷。²⁸若此說邏輯真的在郭的生命裡可以成立，可見西洋小說不只是「影響」郭，而且是在「改造」他。但問題關鍵不在於這些西洋小說是否「糾正」了郭的性傾向，而是要去揭示為什麼西洋小說在近現代中國作為一種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現代性表徵(representation)，它何以被論者長時間裡作為一種「改造」國民性的話語工具，甚至誇張到足以「糾正」中國人的「性傾向」？五四文人曾互相引述戲言：中國的革命是兩部小說造成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是《伽茵小傳》(陳源 38)。這句話似乎至少在郭身上得到驗證。他接觸西洋文學的開始，也是革命意識萌芽的階段。郭在二十年代中旬以後經常強調「文學和革命是完全一致！文學是革命的前驅」(《革命與文學》 227)從認識汪少年接觸到文學以後，文學帶給郭是一種不斷改造自我的體驗，前期郭把這種「自我形塑」作為「自我創造」來展現。

眾所週知，晚清能被譯介過來的西洋通俗小說例如《迦茵小傳》，其價值觀更多是吸收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受到基督教精神所影響的文學和科學，正如有識者指出「這類小說通過感情危機和情場糾葛為我們展示了西洋男女戀愛中所包含的基督教精神、俠義精神、浪漫精神所構成的近代心態」(郝嵐 99)，這類小說「宣告了男女之愛是一種排斥其他關係的強烈情感」(99)。這一切姑且稱之為的「異性戀中心主義」，當然不可能提供任何讓同性愛再現於文本的機會。這導致郭在吸收西洋小說的時期，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閱讀錯位」。一旦他在這些被

(詳後)。郭在《反正前後》，也含蓄譴責自己當時的「墮落」，其中提及兩位陪伴其左右「奮飛」的親密同學兼酒友羅姓和李姓同學，性向皆可疑，該書也記載了當時逛戲園觀賞名旦楊素蘭的唱戲，楊素蘭如何被成都的尹昌衡都督吸引，公然叫他扮成女眷夜進都督府(《反正前後》 174-261)。

28 戴偉·羅易單是在此書第二章的第27條和第41條註釋就採納史劍的分析觀點(Tod Roy 183 & 184)。

當時視為更「文明」的西洋小說裏，沒有辦法在閱讀過程中從中再次確認他和汪少年的同性愛，那種屬於現代性啓蒙催發的「落後感」和「罪惡感」，所謂的「不自然」、「病態」和「內疚感」，就會油然而生。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也是老中國的男性建構(masculinity)，遭遇西方陽剛現代性的「男性氣概」，所引發郭的文化震盪和閱讀上的錯位。老中國的男性建構都是在「陰一陽」、「文一武」或「才子一佳人」之間互相替補，²⁹很少出現西方那種把「男性」和「女性」本質化的二元對立趨勢(Song 14-15)。西方男性氣概的建構往往需要借助對自我的「主客體」想像，即首先需要建立一個作為弱者的客體—她者，以強化自己的主體地位。西方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正是建立在「主客體」想像的基礎上。英雄主義是培植「男性氣概」的溫床，它把女性視為需要解救的欲望客體，以建立自身男性氣概「英雄救美」的浪漫幻想，而浪漫主義也隨之油然而生。19世紀下旬在西方湧現了「很多男孩文學，充斥著大量軍事戰爭和陰謀的書寫，這些書籍通過對戰爭和帝國的頌揚，視之為對男性氣概的嚴峻考驗」(Brady 364)。《迦茵小傳》作者哈葛德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諸種宣揚男性氣概的冒險、神怪和言情小說，其中23部被林紓改譯成漢文，林紓曾說翻譯這些小說的目的，乃是「足以振吾國民尚武精神者」(《埃及金塔剖屍記》譯余剩語) 23)。林紓指出「至光武欲以柔道理世，於是中國姑息之弊起，累千數百年而不可救。吾哀其極柔而將見飮於人口，思以陽剛振之」(《埃司蘭情俠傳》序) 130)。可見林紓有意呼籲國人以小說男主人公充滿男性氣概的英雄主義為榜樣，從而捍衛正受到列強侵略的中國。

正如學者指出，19世紀末的歐洲諸國和美國，國族主義已經被「納為世俗和宗教的信仰，於是人們爭論的要點圍繞著要如何能提高個人的男性氣概行為，而不能讓衰弱的男性氣概降低國族品格」(Brady

29 有關「文一武」和「陰一陽」的男性建構，參見(Louie 1-21)；有關「才子一佳人」和「陰一陽」的男性建構(Song 1-17)。

354)。新興民族國家和社會想像之間的紐帶，經常以現代男性建構的角逐作為集結(Holden 36)。中國人在那動亂時代發展的大趨勢之下，也未能倖免落入對國族建構和男性氣概的強化之中。哈葛德的小說召喚了晚清知識分子的國民性話語。《伽茵小傳》亨利的冒險精神和征服「西方美人」的行為，呼喚了郭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也打開了郭對西方男性建構的認識。

之前汪少年和郭的關係更傾向於「陰陽合德」的男性建構，後者不感覺到前者需要他保護，反而前者像姐姐那樣照顧後者。兩個男孩的形象均帶有國族主體視域下的「弱」、「女」特徵，誠如劉人鵬所述，晚清的「國族主體厭棄女性化、以邁向陽剛性，並且厭棄『弱者』……」（《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168）郭需要尋覓的是類似「西方美人」伽茵的那種「弱者」的他者形象，以便能讓集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於一身的國族慾望的「自我」主體早日確立起來，似乎只有國族慾望的異性戀主義機制：「一強一弱」的權力模式，才可以完成少年中國的陽剛大敘事。³⁰

郭在〈我〉後記坦稱，這本書是20年代末在患病期間內寫成的。「疾病」是本書接近尾聲的重要轉喻。當書中提到少年郭試著想像《伽茵小傳》的女主角是汪少年，遭到挫敗之後，並跟著如數家珍清末的西洋譯介小說。緊接下一章就提到郭在那時害了大病，患上腸傷寒和出現了憂鬱症(hypochondria)的症候，不斷發夢，并發症是中耳炎和腰痛，嚴重影響郭日後的聽力和腰椎，作者把自己余生的耳朵半聾和腰椎的不能久經勞動，視之為「生理上的最大的缺陷」（〈我的童年〉126）。

這段時期少年郭暫時休學，回家養病，也恰好是一段異性戀情緣的萌芽。這段插曲的意義，對作者而言在於暗中轉移自敘傳的敘述焦點，從同性戀過渡到至此以後革命的異性戀敘事。郭至此以後漸漸走

30 梁啟超於1900年在《清議報》發表〈少年中國說〉，詳述參見（梅家玲 33-73）；有關陽剛大敘事，詳述參見（許維賢 184-185）。

向革命敘事，沒有在自敘傳中繼續大書特書同性戀。這一切微妙轉折是以這段疾病和異性戀的敘述為啟始。當年作者康復後，得知與大哥訂婚的五嫂也得腸傷寒，也剛好同時病好。作者的四姐笑道：「**你兩個幸好不是夫婦。假如你們是夫婦，別人會說你們是害的相思病呢。**」(〈我的童年〉 136)五嫂年齡和作者相近，小時候本來她家有意把她許配給郭，但郭在小時候已訂了婚，剛好五哥的未婚妻去世，因此五嫂許配給五哥。郭為了強烈暗示五嫂對自己頗有好感，花了一些筆觸描寫他們倆在月下的敘談，這是郭平生首次感到女生對他的朦朧愛意。後來五嫂產後，吐血去世之前，臨終還不斷喚著郭的小名。郭當時在成都讀書，後來輾轉聽到家人重述此事，五嫂的悲劇挑撥起郭的閱讀錯位記憶，他終於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位女性真正可以和西洋小說《伽茵小傳》對應的弱者形象，他不斷需要通過書寫去召喚這段未了的情緣。

郭非常重視有關五嫂的書寫。1958年迄今的〈我〉版本，添多了幾段作者和其五嫂未了的異性戀情緣。五哥結婚，作者十八歲，大病初愈，再次見到五嫂，百感交集，初版只是寫道「五嫂紅著臉給我一揖」(《我的幼年》 239)。〈我〉1958年版為了增強作者當時對五嫂的悸動和注意，添了以下這段：

照樣是小巧的面龐，雙頰暈紅，雙眉微顰，眼仁漆黑；只是人是長高了。但那細長的身裁，高矮適中。城裡人的穿著是比較入時的，因此，新五嫂的確為家中帶來了新的氣氛。(135)³¹

此外，作者有一年暑假，獨自與五嫂在後堂月下聊天。初版至1947年的海燕書店版本完全沒有提及五嫂在交談中主動透露自己的名字，1958年迄今的〈我〉卻添了以下對白：

31 1947年的海燕書店版本，無此描寫，參閱(郭沫若 152)。

- 「八弟，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王師什麼』呢？」因為她有兩位小弟弟，一位叫王師軾，另一位叫王師轍，是說要學習蘇軾和蘇轍。
- 「對了，我叫王師韞。」
- 「是謝道韞的韞啦。」
- 「你猜對了。」(139-140)³²

作者顯然要藉這些對白，給美人於正名，並渲染彼此的主動性，以及他倆關係的曖昧性，以加強此自敘傳的「異性戀」氣氛，³³至少要達到平衡書裡的同性愛描寫。雖然郭和五嫂的互通款曲，有悖於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庭倫理，然而畢竟只停留於心靈上的仰慕，不像同性戀行為那樣付諸於行動，因此非但不會對主流讀者產生驚嚇，反而達到一種意猶未盡的親切。

對男女幾場大病「惺惺相惜」的敘述，顯而易見是敘述焦點的重大轉移，作者似乎可以從此把汪少年和他的同性戀情輕輕帶過去了。對疾病例如「神經衰弱」、「憂郁症」和「歇斯底里」等近乎沉迷的敘述，是五四作家從創造社到新感覺派諸家共同喜歡重複的敘事傾向。³⁴這些憂鬱症候的頻頻再現，昭示了郭沫若這一代人透過現代自我反思或形塑自我的集體受挫。疾病的當下隱喻，可以讓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或困擾作者的心結，永遠變成書寫的一種過去式。〈我〉對同性愛的處理，正以一場疾病的敘述，隱隱約約把同性愛轉化成一種童年無知的修辭過去式，病癒後象徵著作者的長大成人，同性愛也不過是作者在將來省思自己年少輕狂的學堂歲月的其中一種時代「症候」而已，正如作者在此書前言夫子自道：**「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

32 1947年海燕書店版本，亦無此段描寫，參閱(郭沫若 157)。

33 可能郭當年沒意識到，這段微帶含有近親戀(亂倫)的描寫，不見得即是主流所謂正典的異性戀。

34 有關五四知識分子如何熱衷於為五官感受和心理疾病命名，參閱(彭小妍 205-248)。

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2)。而上述這一切「症候」，為日後郭的「自我改造」和革命論述埋下伏筆。

三、「走向革命」：「發現兒童」和「自我改造」

在革命前夕，郭對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的中國，而引發的現象之反思和批判，是與個人「性的覺醒」和「自我創造」一併進行的。這兩者之間在前期郭的革命論述裏，非但沒有衝突，反而是相輔相成；但後來革命論述和個人的性意識逐漸產生矛盾和衝突，「自我創造」漸漸演變成「自我改造」。桑梓蘭在論及〈我〉裡的同性愛描寫，頗欣慰表示：

雖然1930年代的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主要的興趣事物是國族建構，但同性愛關係未必讓他們害怕或感到譴責，他們沒有自動把同性愛和國家衰敗掛勾，也沒有把同性愛視之為國家衰敗或精神疾病的症候(Sang 158)。

另一位研究者則認為，由於帝國主義勢力侵入，描寫同性愛的五四作家，傾向於把中國的衰敗，轉化成對男同性愛短暫和脆弱的的傷痛(Kang 61)。上述兩種看法相左，需要更多歷史上下文的追溯和釐清。首先，究竟事後郭有否對過往的同性愛行為「害怕或感到譴責」，而把同性愛視之為國家衰敗的症候？

年輕時候與郭、田漢合著《三葉集》的宗白華，晚年在北大湖畔與陳明遠追述：「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國會，但是許多會員表示，『吾會中會員，入會時取格極嚴……況土人無行，自古已多，今世學者尤多反復無常之小人。故吾會友介紹新會員，當慎之有慎，審之又審……』」(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252)少年中國學會是「……

『五四時代』歷史最久，會員最多，分佈最廣，影響最大……」的社團（郭正昭、林瑞明 83），³⁵郭最終未獲批准入會，³⁶原因是他「嫖娼狹妓、搞同性戀、酗酒鬧事、自暴自棄的不良行為……」（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 252）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有幾位都是郭在成都高等中學堂的同學，³⁷宗白華表示是這些人揭露郭的過去，導致郭無法入會。這件事，對當時尚未在五四文壇成名的郭打擊很大。《三葉集》有幾封郭遠在日本寫給宗白華和田漢的信函，赤裸裸把郭當時「害怕或感到譴責」的罪惡心情展示出來：

我昨晚寫了一封信，還不曾付郵，今晨上學，又接到你的惠書，我才知道我從前所鬧出的事情，時珍早對你說了……我常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i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懺悔錄》來，以宣告於世。我的過去若不全盤吐瀉淨盡，我的將來終竟是被一團陰影裹著，莫有開展的希望，我罪惡的負擔，若不早卸個乾淨，我可憐的靈魂終久困頓在淚海裡，莫有超脫的一日（〈郭沫若致宗白華函〉 35）。

這段剖白有幾行差不多就是〈我〉的前言初稿，不過在1928年12月卻被作者改成「我不是想學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什麼懺悔，我也不是想學Goethe和Tolstoi要描寫什麼天才」（郭沫若《我的幼年》

35 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還包括當年尚未公開共產黨員身份的毛澤東、李大釗和張聞天等人（郭正昭、林瑞明 149）。前後入會會員查得112人，會員名錄參見此書附錄（200-202）。

36 少年中國學會初期設定申請入會者須要五名介紹人，而且介紹人與被介紹人必須同地（郭正昭、林瑞明 98）。

37 例如曾琦（慕韓），王光祈（潤嶼）、魏時珍和周太玄等人。這些同學大部分均在郭〈反正前後〉稍有記載。曾琦、王光祈和魏時珍跟郭同班。郭認為由於自己當年是插班生，同年輩的同學們跟他格格不入，都視他為「異民族」。郭嘲弄為首的曾琦是「聖人」，挖苦他滑稽和老氣橫秋之面（郭沫若〈反正前後〉 176-195）。

1-2)。雖然作者開宗明義表示〈我〉不是一部盧梭式的《懺悔錄》，然而〈我〉挪用《懺悔錄》那種把自我批評和懺悔導向對舊時代的控訴語調，不斷向讀者暗示他過去之所以在性行為上越軌，乃中國封建時代的兒童教育制度出現問題。例如作者在〈我〉裡始終把「偷營」事件和自己被男生索愛的經歷稱之為「**畸形的小學生活**」(93)，進而在文中提倡正確的兒童教育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必要性。

與其說郭在懺悔，不如說他一直強調在患病期間完成〈我〉，這種告白本身帶有向童年期退化的神經官能症(neurosis)的論述烙印。這不表示郭的童年時代真的是培植神經官能症者的溫床，而是郭在「**揭發童年時代諸種導致兒童未開化的制度性質**」(Foucault 81)。郭把自己性的早熟，主要歸咎於發蒙時期所讀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聖經賢傳，它把發蒙期讀的《三字經》「**蔡文姬，能善琴。謝道經，能詠吟。彼女子，且聰敏。爾男子，當自儆**」也當作「**淫書**」來反思，認為中國兒童的發蒙讀物很有問題(49-50)。早在1921年，郭在〈兒童文學之管見〉一文已疾呼：「**人類社會根本改造的步驟之一，應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應當從兒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著手。**」(《郭沫若和兒童文學》3-4)此項呼籲把「人的改造」推到兒童階段就得開始，可視為郭最初「自我改造」意識的萌芽。而這萌芽起源於他一如當時為數眾多的五四作家與日本作家一樣，發現了一個作為科學方法論的兒童概念。

盧梭是發現兒童作為科學方法論的第一人(柄谷行人 124)，正是他的兒童教育小說經典《愛彌爾》把孩子成為可供人們觀察的存在。留日期間，郭從盧梭和受到《懺悔錄》文體影響的日本私小說裡得到啟發，不僅頻頻以第一人稱「我」創作私小說，更以第一人稱「我」展開自敘傳。盧梭自我暴露和自我剖析的文風，尤其影響五四創造社的成員。這個兒童在〈我〉，不但成為作者剖析的對象，更成為讀者觀察的客體。

雖然沈從文覺得〈我〉等自敘傳「**雖說這是自敘，其實這是創作**」

(〈論郭沫若〉 77)。但郭一開始就企圖說服讀者相信，本書「純然是一種自敘傳的性質，沒有一事一語是加了一點理想化的。」(〈我的童年〉 151)這番表白，極似盧梭作《懺悔錄》的初衷，他認為《懺悔錄》即是「一幅完全依照本來面目和全部事實描繪出來的人像」(盧梭 23)。盧梭批評以往那些書寫自傳的作家「總是要把自己喬裝打扮一番，名為自述，實為自贊，把自己寫成他所希望的那樣，而不是他實際上的那樣的」(盧梭 13)郭寫作〈我〉的初衷，也是完全想把過去自己「實際上的那樣的」，自我暴露在讀者眼前，這可視為他個人化的自我想像。

然而〈我〉在往後的增刪過程中，尤其是1947年增添的〈序〉，顯示作者有意把當初個人化的自我想像，提升到理想化的自我想像。雖然他表面上還是暗示自己無意學奧古斯丁和盧梭進行一種神學或道德上的懺悔：「我沒有什麼懺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負責的。」(郭沫若〈少年時代[序]〉 1)但更重要的是這句話的上文：「中國社會的蛻變是過了時的，這使我們這些出水的蜻蜓，要脫皮真是艱難。像我自己脫了五十多年，一直都還沒脫乾淨。」(1)再來，就是最後一句「覺醒著的人應該睜開眼睛走路，睜開眼睛為比自己年輕的人們領路」(2)。換言之，最重要的是郭認為自己已「覺醒」，雖然還嫌「自我改造」還不夠徹底，不過已經有能力領導年輕人走上正道。

到底郭對自己同性愛行為是否「感到譴責」？從1920年至1947年，作者歷經二十多年的反覆內心掙扎。不過1920年作者在寫給宗白華和田漢的信函裡，28歲的郭，確實對著比他小好幾歲的宗白華，表示他的「害怕和感到譴責」：

我前幾天才在朋友處借了《少年中國》底第一二期來讀，我有幾句感懷是：……我看見我同學底少年們，／一個個如明星在天。／我獨陷沒在 Stryx 的 amoeba，／只有些無意識的蠕動。／咳！我禁不著我淚湖裡的波濤洶湧！／……慕韓，潤嶼，時珍，太玄，都

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對著他們真是自慚形穢，真是連amoeba也不如了！咳！總之，白華兄！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現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採集些香木來，把我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著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燒毀了去，從那冷淨了的灰裡再生出個「我」來！（〈郭沫若致宗白華函〉13-14）

郭強烈自責，不但覺得自己不配做人，甚至連做一只變形蟲（amoeba）都不如。單是「嫖娼狹妓」，當時從晚清過渡到五四時期的文人，多半帶有名士的這些癖性，這不還至於讓郭「自慚形穢」。³⁸宗白華所謂的「搞同性戀」才是最終導致郭被拒絕進入此會的主要原因。少年中國學會的其中宗旨是「轉移末世風俗」（郭正昭、林瑞明 24）。第九條綱領即是「反對現時智識界個人享樂主義的趨勢」（〈少年中國學會蘇州大會宣言〉3）。創辦人之一王光祈在〈「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呼吁中國人改造個人生活，并表示他最反對兩種個人生活：「（1）不自然的個人生活；（2）無秩序的個人生活」（王光祈 51）。郭在第二本自敘傳〈反正前後〉，也承認自己在成都高等中學堂的生活是「無為、墮落、自暴、自棄」（75）。³⁹他少年叛逆的形象，在五四知識分子的論述裡卻被蒙上「落後」、「墮落」與「罪惡」的封建社會陰影，只要郭一天不表述他的「懺悔」，不但他會被隔離於五四知識分子的新文化圈，而且他與他的作品也會被眾人拒於五四現代性的門外。⁴⁰

38 五四文人跟妓女頻密交往，從陳獨秀到郁達夫都公開承認自己出入青樓。這些行為都無損於他們當時在五四文壇的地位。

39 大陸郭沫若專家馮錫剛，近年也認為郭的「自慚形穢」，「顯然是同學期間的不良行為所致」（《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33）。

40 當然這不是說郭沫若只是靠懺悔才被接納進五四新文化圈。誠如匿名評審提醒，他後來祭起「為藝術而藝術」的大旗挑戰文學研究會的權威，從而確立自己的文壇地位。然而，五四作者和讀者接受「為藝術而藝術」，跟他們能不能接受「同性戀」，這是兩碼事，無法混為一談。

當時的宗白華還希望郭能真正「懺悔」：「我想人孰無過，少年時，乘一時感情，尤易做出越軌的事，我向來以為一個人做錯了事，只要懺悔了，又做些好的事業，那就抵消了。」（宗白華〈宗白華致郭沫若函〉 25）從這段話的「乘一時感情，尤易做出越軌的事」，主要指涉之一即是「搞同性戀」，因為「嫖娼狹妓」還不至於讓文人僅「乘一時感情」就能進行的行為。⁴¹郭為了真正表示他的「懺悔」，一如宗白華在晚年指出，在寫上述信函的兩天後，郭在一天之內完成了成名作〈鳳凰涅槃〉（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 253）。

眾所周知，〈鳳凰涅槃〉在廣義上象徵中國國族的新生。劉紀惠認為郭的新詩包括〈鳳凰涅槃〉，通篇「火」的意象「**釋放出妄想式的精力投注**」（劉紀惠 217），這些被神聖化的「自然」意象，包括「太陽」，從1920年代初期的《女神》一直延續到郭晚期那些歌頌毛澤東的作品。這一切顯露了郭的妄想症候。在劉紀惠或不少研究希特勒納粹文化的學者看來，妄想症候與法西斯衝動有所關聯。佛洛伊德認為妄想症候是源於患者對自身同性情慾的抗拒，由於遭遇社會鄙視和羞辱，這些受阻的同性情慾加劇妄想症的發作。（Freud “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43-60）郭的同性情慾經驗顯而易見受到當時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的集體鄙視和排斥，這逼使郭當時通過〈鳳凰涅槃〉，發出摒棄自己以往同性愛行為的身份宣言：「**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郭沫若〈鳳凰涅槃〉 53）。

田漢當年讀了〈鳳凰涅槃〉後，拍案叫好，寫信給作者：「**我在這裡等著你的『新我』New Ego啊！**」（田漢〈田漢致郭沫若函〉 28）郭把自我比喻成浴火重生的「鳳凰」，這是他自我形塑「**個體神話**」的起點，麥克亞當斯認為這種「**個體神話的形塑 (fashioning)**」，既不是自戀妄想的演習，亦不是嘗試把自己視為上帝的偏執，而是要從神話中定義自

41 嫖娼和同性戀的主要差別之一，在於前者一定是消費行為，男人有錢，即可嫖娼。然而後者多半不是消費行為，情感因素必須考慮在內。

我，這可被視為一個人持續發展的心理邏輯和社會責任。」(McAdams 35)郭頻頻挪用中西神話中的鳳凰典故，襯托出自己死火重生的「個體神話」，從而創造一個作為異性戀的「理想化」自我形象，以對應五四時期眾人對現代中國的想像：「『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我的那篇〈鳳凰涅槃〉便是象徵著中國的再生。」(郭沫若《學生時代》 64)這也是作為浪漫主義的詩人自我得以確立的時刻。在西方現代性的影響下，五四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國族主義，和詩人的浪漫主義情懷一拍即合，並作為對詩人年少過去與同性發生「激情之愛」(passionate love)的替代。「浪漫之愛」(romantic love)「為長久生活提供軌道，朝向某種在期望之中，卻又可實現的未來。」(Giddens 44-45)因為通過對「女神」和「中國」這些「弱者」的他者救援，它暫時允諾了詩人把自身納入自由、平等與自我幸福實現的五四新型社會紐帶之中。

另外，1910年代下半旬，郭在日記和詩文中，斷續描述自身患有憂鬱症狀的心理疾病。就在郭留學日本寫了〈蔗紅詞〉，遙寄汪少年的隔年之後，即1916至1917期間，郭自稱是他「最徬徨不定而且最危險的時候。有時候想去自殺，有時候又想去當和尚……我時常問我自己：還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來執著這個世界呢？還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個世界？」⁴²這段期間，郭含蓄自言寄居異鄉，讓自身嚐到孤寂的痛苦。這種幾乎導致他自殺的痛苦，縱然郭未能直明，然而可以推論其中原因之一，是他痛苦於要持續自身同性戀的本能，抑或放棄此本能。顯然後來郭在1920年代初漸漸走向革命，選擇了後者。

這個選擇本身與郭的憂鬱症狀，交織了現代「社會競爭—壓迫」諸形態的多重決定。社會競爭大致可劃分為三類。其一、分配的競爭：

42 郭也承認這段期間，他和日籍女友安娜的異國婚姻，遭到安娜父母反對，也令郭苦惱。這些交織著同性戀和異性戀的痛苦，顯然讓郭痛不欲生，想要自殺顯然就是郭當時相當明顯的憂鬱症狀(郭沫若〈太戈兒來華的我見〉 185)。

表現為生存的競爭，影響到人們的階級、經濟收入等的競爭；其二、認可的競爭：追求正面認可，避免被歧視；其三、政治的競爭：爭取政治參與的競爭，此類競爭會影響個人所面對的法律與制度。⁴³ 這三類競爭源於社會的分配、認可和政治的不平等或不正義。激烈競爭非但沒有促進正義，反而在不正義的條件下彼此爭奪壓制，結果競爭往往導向持續、強化或甚至惡化不正義的現況。這一切構成了現代「社會競爭—壓迫」機制的基礎。社會性少數如同性戀者，在現代「社會競爭—壓迫」機制下，有者極易顯現憂鬱症狀，被這個機制從性少數實踐的「暗醜自我(真實自我)」，強行拉回大多數人奉行的「正常自我」。⁴⁴ 因為只要個人不屈從於這個「社會競爭—壓迫」機制，個人在上述的三類競爭中，就會自動被「社會競爭—壓迫」機制淘汰出圈或邊緣化。最嚴重的後果即是自身被推向面臨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危機。

郭中後期選擇壓抑自身的同性戀愛，跟上述的現代「社會競爭—壓迫」機制脫離不了關係。他的同性戀傾向，導致他在五四前後時期，被少年中國學會拒於門外，這意味著在他還沒開始競爭的時候，已失去了競爭的資格。這個事件提醒他避免被歧視的最佳方法，就是追求社會正面認可的「正常自我」，壓抑本來的「暗醜自我(真實自我)」。為了爭取出線的機會，郭於1920年代日漸參與政治，投入政治參與的競爭，漸漸「走向革命」成為他企圖與「社會競爭—壓迫」機制協商的選擇。

雖然郭在創辦創造社前後，打出「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不過個

43 有關「社會競爭—壓迫」的論述和觀點，參閱(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120)。

44 有關「暗醜自我(真實自我)」和「正常自我」，參閱(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122)。此書作者認為有一類人在成長時期有個自我的暗醜，此暗醜十分深沉幽暗，而他們主觀上卻自覺面臨巨大壓力需要矇混假裝成「正常」，郭恰好是這樣的一類人，〈我〉記載少童時期的同性戀愛經歷，正是郭當時的暗醜，因此此論用在郭的個案上是適當的。

人經濟的困境，現代中國社會資源分配的激烈競爭，一直讓歸國的他
在上海大都會面臨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危機，這一切使他漸漸放棄「為
藝術而藝術」的「自我創造」理想。郭自從1923年從日本留學回來，攜
妻帶子，寄宿泰東書局(即《創造季刊》的出版發行公司)，生活非常拮
据。徐志摩曾攜同胡適等人拜訪郭，在日記留下對郭住宿的紀實記
載：「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敝服(舊學生服)狀殊憔悴……
沫若居室隘，陳設亦雜，小孩摻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
揩拭……」(陸小曼編《志摩日記》31)。過幾日，郭邀胡適等人吃晚
餐，胡適日記如實記下當晚發生的趣事：「是夜，沫若、志摩、田漢都
醉了。我說起我從前要評《女神》，曾取《女神》讀了五日，沫若大喜，
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適 121)可見當時郭雖已有妻兒，但以往同
性愛的作風，在宿醉一番，禁不住流露出來。⁴⁵

郭等人當年為「泰東書局服務而無定薪，受著奴隸剝削」(宋耀宗
29)，再加上「二七」運動後的社會局勢動盪，1924年郭只好托友人把
妻兒送回日本。同年翻譯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
與社會革命》，在上海辦刊賣文的艱難生活，亦親歷民眾下層之苦，這
一切讓他的思想逐漸產生劇變：「朝向剷除病根的革命與開刀之決心」
(劉紀蕙 169)。1925年他說：

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間與水平線
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去
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
由，未免處於僭妄。……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
性。享受自由，大家應得同樣地享受自由(郭沫若《文藝論集》
序) 216)。

45 《志摩日記》也有如同記載：「前日沫若請在美麗川，樓石庵適自南京來，故亦列席。
飲者皆醉，適之說誠懇話，沫若遽抱而吻之。」(陸小曼編 36)。

這段話昭示郭對過去「為藝術而藝術」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正式告別，也是他走向革命的徵兆。1926年他正式發表〈革命與文學〉一文，號召「對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要根本剷除，我們對於浪漫主義的文藝也要取一種徹底反抗的態度」（郭沫若 235），自認看清了「徹底的個人的自由，在現代制度之下也是求不得的，你們不要以為多飲得兩杯酒便是什麼浪漫的精神，多謔得幾句歪詩便是什麼天才的作者，你們要把自己的生活堅實起來，你們要把文藝的主潮認定！」（235）在早期郭「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中，文學不但與政治勢不兩立，而是前者拒絕後者干擾；但來到1926年郭的自我表述中，政治已全然主導文學。這是郭自我轉向的關鍵時期，他不但對自己年少輕狂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做了徹底的否定，也批判過去愛喝酒作詩，自認浪漫主義的自己。這一切強化他「理想化」人格功能背後的動力，主要來源於他在當時從作家搖身成為政治家的自我身份調整。

1926年正是郭政治生涯的開始，但最初不是參加共產黨，而是加入國民黨。這段日子郭非常受到蔣介石器重，短短不到半年時間，把他從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升遷到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⁴⁶並且參與了北伐。35歲的郭沫若亦於1926年在廣東初遇34歲的毛澤東，十年後郭沫若在自傳〈創造十年續編〉回憶當時的情景，並以「**狀貌如婦人好女**」來形容青年毛澤東（郭沫若《學生時代》272）。

郭沫若偏愛的男生類型，在〈我〉裡出現的那幾位都是瑞麗的女性相貌。這次以「**狀貌如婦人好女**」來比喻青年毛澤東，多少表示了郭沫若對毛澤東抱有好感。當時的毛澤東非但不是中共頭目，甚至連競選中共中央局委員都落選。郭還以一句「**沒有預計過他一定非『魁梧奇偉』不可的**」給自己提高了一個台階（《學生時代》273），可見當時郭沫若視自己為強者，「**狀貌如婦人好女**」的青年毛澤東處於等待郭沫若

46 有關詳細經過，參見（蔡震〈在與國共兩黨的關係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論與此相關的史料之解讀及補充〉20-27）。

搭救的弱者位置上。郭對毛的好感，恐怕最初很可能首先是建立在對其面貌的視覺好感上，再來才是彼此政治革命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換言之，無論這是否是郭的一廂情願，郭與毛澤東至此以後的互動，不應被純粹視作政治結盟，這還包含郭把毛視之為生命中的要角之一。⁴⁷

國共合作的那段時期，郭意氣風發。他一方面與國民黨保持緊密關係，另一方面暗中得到中共支持。這段左右逢源的日子畢竟不可能維持多久，在別人還沒揭穿他的雙重身份之前，他必須對兩黨的革命政治立場，最終作出抉擇和表態。1927年他主動與蔣決裂，撰寫二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和〈脫離蔣介石以後〉，揭露蔣暗中僱傭地方黑幫勢力，剷除共產黨份子。

國民黨之所以當年查禁郭的著作包括〈我〉，顯而易見是郭在1927年三、四月間與蔣公開決裂後的餘波。郭於1927年四月被免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職務，同年五月國民黨以「國民政府秘書處」名義，發出〈通知軍政長官通緝趨附共產之郭沫若函〉。為了躲避蔣介石的通緝，1928年他遠赴日本逃難。〈我〉正是在日本養病期間完成的回憶錄。

〈我〉面市後，一版再版，非常暢銷，根據蘇雪林的說法則為「**動輒銷行數萬冊**」（《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86）。沈從文向讀者暗示，郭當時流亡為了生存，藝術創造力大不如前，只能販賣極度私密的個人回憶維生，甚至「**書賣到那樣貴**」，也責怪郭為了賺取多一些稿費，故意把篇幅拉長，沒有「**把文字節略一點……**」沈從文從商業文學的角度否定此作的純文學價值（〈論郭沫若〉81）。五十年代史劍在《郭沫若批判》更以「市場看旺」來分析郭當年暴露自己少時同性戀愛的動機：

對於變態性欲作如此坦率的記載，就在《金瓶梅》上也是少見的。

郭沫若的坦白，真到了驚人的地步。他寫作自傳是在民國十八年

47 感謝匿名評審提供此見，不敢掠美。

(一九二九)，是國共分裂之後，他流亡日本的初期。這時候，郭沫若是相常自暴自棄的，他的「反叛個性」，也於該時發揮至高潮。因此而留下這樣的記載，另外一方面描寫性變態的文學，在市場上總是看旺的，此亦郭沫若坦白的原因之一(28-29)。

史劍也在書裡大篇幅摘錄郭描寫同性戀愛的段落，以論證郭是「**一個有變態心理的人**」，這一切均以「**生理缺陷的影響**」之名來解釋後來郭之所以成為文化弄臣的理由(《郭沫若批判》 24-44)。從沈從文到史劍，均認為此作的不得已出版，乃是作者賣文為生的惡果。

本文不以為此作是當年郭窮困潦倒，為了吸引讀者購買的一時應急之作。首先，〈我〉不是如史劍以為作於1929年，其正文早於1928年4月完成，同年12月補上〈前言〉，次年1月12日校閱全文並作〈後話〉(龔濟民、方仁念 190-197)，在這期間，創造社每月寄給郭的一百元生活費，在當時的條件下「基本上可以保證一家人衣食無虞」(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 201)。創造社出版部是於1929年2月被國民黨封閉後，才開始斷絕每月寄給郭的生活費。因此不能說此作純粹是為了糊口的應急之作。再來，如果此書有關同性戀愛的大膽描寫，只是商業噱頭，郭大可在新中國成立後，「有愧」於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的「尊貴」身份，極易可以下令屬下機關把自己那些極度私密的自傳文字全部刪去。但郭下半生作為中共文化班頭和科學院院長的政生涯，雖然他很頻繁一字一句修改自己以往著作，但就是不曾把那些有關自己「同性戀愛」的描寫刪除或修改，即使這些描寫落入其敵對陣營例如史劍手裡，成為妖魔化郭和批判其下半生成為中共弄臣的人格憑據。

〈我〉坦白展現晚清少童時期的同性情慾。同性情慾在晚清畢竟並非驚世駭俗。康有為在《大同書》有云：

女色既易，固可無犯。然美男破老，固又有好男色者，雖索格拉底已有之矣。雖非陰陽之正，或於人身有損，然好色亦未有不損者。人情既許自由，苟非由強合者，則無由禁之……太平之世，男女平等，人人獨立，人人自由，衣服無異，任職皆同，無復男女之異，若以淫論，則女與男交，男與男交，一也。其時人太安樂，不患人類之不繁，無待過慮。其有歡合者，不論男女之交及兩男之交，皆到官立約，以免他爭(181)。⁴⁸

康有為想像男同性愛的合法結合，除了可被視為是他主張「毀家廢婚」大同世界理想的延伸，⁴⁹亦是他要破除「亂界」之「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康有為《大同書》25)。康有為認為兩男相戀只要符合兩項條件，即其一「苟非由強合者」；其二「不患人類之不繁」，兩男當去政府機關注冊，以避免第三者的相爭(《大同書》181)。康有為從近代天賦人權的平等權角度，肯定兩男結合，亦是未來中國晉升「太平之世」可欲的結合制度，即國家法可以通過登記夥伴的方式，以滿足男同性戀者結合的慾望。不過康有為認為這必須取決於人類文明的「三世」演進，即「據亂、昇平、太平」三世。在他看來，「據亂」是君主專制之世；「昇平」是君主立憲之世；而「太平」乃民主平等之世，只有達到「太平之世」，男同性愛的合法結合才得以實現。由於康有為在世深感中國乃處於「據亂」之世，故「雖著此書，然秘不以示人，亦從不以此義教學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3099)。生前一直感慨身逢中國亂世：「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因而拒絕把《大同書》，全文公開付諸出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3099)。⁵⁰這導致康

48 感謝劉人鵬提示有關材料。

49 有關康有為「毀家廢婚」論，參見(劉人鵬〈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33-68)。

50 康有為生前只把《大同書》的甲、乙二部於1913年和1919年分別公開發表和出版。全書在康有為去世後，1935年方由其弟子錢定安整理出版，而康有為的上述「兩男之交，皆到官立約」主張是出現在辛部〈去亂界治太平〉。雖然估計郭於1928-1929年撰

有為對男同性愛的開放想像，在近現代中國也僅止於隱而不顯。康有為和較後的郭一樣，並未把對同性戀愛的接受立場和想像動力，化成當時現實的社會實踐訴求。⁵¹

《大同書》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1901至1902年流亡印度時的撰述，⁵²跟〈我〉成書的作者流亡背景頗相似。流亡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的離散空間，讓流亡者暫且擺脫諸種身份政治的牽絆，面對可能時日無多的朝不保夕歲月，從而更能蕩蕩然對諸種生命經驗或邊緣觀察付諸於紙墨。此類離散書寫本身即是一種脫政治的政治性寫作。《大同書》再現的是康有為歷經屢次上書、變法失敗後的自我療傷與寄望於未來；〈我〉再現的則是郭經歷革命高潮與低谷後的虛脫以及對過去的自我整理。⁵³

有研究指稱，郭對參與一係列重大事件的描述，其實都在向讀者展示郭對自身身份的認定，只有流亡期間，郭「放棄」了對自身身份的認定（陳宇 18-19）。正是撰寫〈我〉期間，他正被國民黨通緝，流亡讓郭「放棄」了對自身身份的認定，才可以讓他毫無拘束地書寫身體與慾望。起初郭在被通緝期間，東藏西躲於上海，即在1928年2月18日的日記重抄過去寫給汪少年的〈蔗紅詞〉（郭沫若〈離滬之前〉 282）。〈我〉寫於同年的三到四月期間。郭對〈蔗紅詞〉的重抄和追憶，是為醞釀〈我〉熱身。國共革命的幻滅，亡命日本的他只能重新藉著書寫，召

寫《我的幼年》時，並不一定曉得康有為的上述主張，但不排除《大同書》的此主張很可能私下漸漸局部流傳於海內外的知識圈子。關於《大同書》的定稿和成書過程，資料參閱〈大同書·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 2）。

51 無論如何，此主張對當代華人同志可以不需全盤依賴歐美歷史經驗語境，反而可以回到中國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屬於華人同性結合制度合法化的理論根據，具有示範作用。

52 此說最初出自〈梁啟超〈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11〉，後經湯志鈞考據證實。有關《大同書》撰述緣於何時的諸種爭議，湯志鈞根據《大同書》原稿，提出有力的辯駁和論證（湯志鈞《康有為傳》 364-399）。

53 感謝匿名評審提供此說，不敢掠美。

喚被壓抑的同性愛記憶，作為對生存現實的回應和抵抗。這段朝不保夕長達將近十年的流亡歲月，也是郭一生中在創作、翻譯和學術研究的噴發期。除了書寫自敘傳和翻譯大量作品與理論，他幾部最重要有關甲骨文和金文的諸種學術著作，均在這段期間完成。

當年郭決定出版〈我〉，不是沒有猶豫和汗顏，不然也不會在〈後話〉裡模擬讀者的疑問：「你這樣的文章為什麼要拿來發表？」郭把自己販賣回憶錄糊口的行為，自嘲為一種：「採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罰：把這個腦袋自鋸了下來。」（郭沫若《我的幼年》 269）〈後話〉表面上以「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自我解嘲，實質上是衝著國民黨口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同時也諷刺國民黨的「反革命」隊伍對他的迫害（郭沫若《我的幼年》 269）。

1929年《我的幼年》甫出版發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藉文藝刊物而宣傳共產」為名查禁該書。在「中央取締反動文藝書籍一覽」中，該書又以「普羅文藝」之罪名被查禁（盧正言 42）；根據郭的敘述，上海特別市黨部「命令指出本書二十頁內中一段及後話內之最後二句詞句不妥，暫停發行」（郭沫若《幼年時代》）。所謂「後話內之最後二句詞句」指的是下面段落的最後兩句詞句：

讀了這部書的人如能夠忍耐著讀到掩卷，在掩卷的時候假使在心中要這樣問我：「你這樣的文章為什麼要拿來發表？」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說：「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郭沫若《我的幼年》 269）。

這兩句「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在1931年文藝書局版的《我的幼年》裡，只剩下前句，後句作者以省略號取代。後來在1933年版的《幼年時代》，前後句都被作者自行刪除，只剩下作者刻意標下的

省略號，一直到1947年的海燕書店版才從此得以恢復。⁵⁴

當毛澤東於1941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喊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 658)，郭在四十年代初為了鞏固自己作為中共中央所指定的魯迅接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完成周恩來所封予的「**革命文化的班頭**」，郭在四十年代後，多次把自己二、三十年代攻擊魯迅的文章進行潤飾和刪改(周恩來〈我要說的話〉 447-449)。

四十年代發生一場筆戰，已預先為郭在將來新中國歷史被指責為弄臣的命運，埋下伏筆。1943年史學家孫次舟撰文指出屈原是楚懷王的男妾，並以〈離騷〉的「**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來推論屈原是「龍陽」(傅錫壬註釋《新譯楚辭讀本》 33)。郭在一個月內連續寫兩篇文章駁斥孫次舟，他否認屈原是龍陽，他認為是楚王的寵姬要追求美男子屈原不果，惱羞成怒加以反噬，此事件〈離騷〉並未提及，郭是舉《楚辭·卜居》為證。然而胡適和遊國恩皆指出《楚辭·卜居》並不是屈原所做(傅錫壬註釋《新譯楚辭讀本》 138-139)。

屈原是郭最敬佩的中國詩人，與其說屈原不是龍陽，不如說郭為屈原辯護的同時，更多帶有自度度人的焦慮。五四作家中，郭的創作最明顯受到屈原的啟發和影響，其新詩和歷史劇，多處直接採用屈原的史料和創作改編。再加上少童時代的同性戀經歷，本來郭應是最能接受此說之人。但郭卻力圖要大家排除屈原是龍陽之說。在兩篇反駁文章中，他不斷反覆告訴讀者，屈原的詩帶有強烈的人民意識，即使他是弄臣，也值得大家讚揚。郭為屈原叫屈，其實或許更多是為自己

54 另一段所謂「本書二十頁內中一段」指的是以下這段話：「總之我母親是與憂患俱來的人，從小時候起便受著災難，聽說我們川南現在是討赤最力之都，大約因為我一人的關係，恐怕又已經「赤化」了九族罷？管他媽的！牙齒總有要牙齒償還的時候！」(郭沫若《我的幼年》 20)。這段話以「討赤」之說，暗諷國民黨到處抓拿共產黨份子。這顯然也惹怒了國民黨當局。也許所謂「赤化了九族」說法並沒有真正發生於郭的四川家族，因此初版《我的幼年》以上這段話，一直到目前的〈我〉裏，都不見恢復。

辯解。郭畢竟不是屈原。他曾說過：「對於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歡，而獨於不喜歡他的自殺」(郭沫若〈從詩人節說到屈原是否是弄臣〉75)屈原當年投江，或許也不過想為後世證明「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而新中國歷史那些無數支清濁難分的河流，大概再也不會激起中國作家投江的衝動。郭的悲哀在於：他無江可跳，他只能永遠像個被國家歷史之手牽動的木偶，永遠站在歷史的舞台上繼續加場演出，雖然台下的觀眾都快已經走光了。

為了迎合國家政治運動的時勢需要，四十年代和建國後的郭更不惜大量「修改」自己前期的作品，如同「修改」自己的記憶—從少年時代的「激情之愛」過渡到「創造社」的浪漫之愛，到最後演變成革命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以便為國族的權力話語服務。諸多刪改中，唯獨對《我的幼年》的同性戀描寫只字未刪，足見郭對同性戀即使從未張揚，但亦不刻意避諱。只字未刪不意味著作者對同性戀愛毫無愧疚。同性戀記憶對郭而言，始終是他在危難期間發憤而抒懷國家衰敗與革命挫折的徵候。〈我〉的意義，正在於再現了郭「自我創造」在過渡到「自我改造」的過程中，自我想像如何銘刻了作者的「性的覺醒」、同性情慾與國族主義短兵相接後的複雜糾葛和自我形塑。晚年郭跟少年陳明遠的魚雁往返，不但可被視為〈我〉返老還童的極度含蓄版，亦是他對革命挫折的自我救贖。

四、魚雁往返與互相唱和：陳明遠、郭沫若與毛澤東

1949年58歲的郭被任命為新中國副總理。從1949年一直到1978年去世，郭沒留下自敘傳。倒是暗中從1953年至1966年與陳明遠頻密通信和留下來「疊起來有半人高」的修改詩文稿，除了可作為窺視他晚年心境的另類自敘傳，也足以再現晚年郭的同性戀情結如何被壓抑變形(肖露丹 383)。1980年代後，這些信函和詩文稿漸漸曝光，郭家

屬抗議，不但與陳明遠打筆戰，也把他告上法庭，陳明遠最終敗訴，⁵⁵引起各方爭論。陳明遠向記者透露，他對郭的了解還有很多世人未知的真實情況，有人害怕他逐漸披露這些情況，通過打官司否定《新潮》，⁵⁶通過否定郭給他的信，使他提供的郭情況都蒙上「虛構」的影子，這是一種「封殺」戰術(李延華 26)。

信函據悉總共「二百多封」，但至今公佈於世人的信函僅六十九封(肖露丹 383)。陳明遠從12歲就開始和郭通信，郭在這六十九封信裡，有三次直接表示他對陳明遠的愛意。第一次是陳明遠21歲之際，郭於1962年5月9日的信函這樣寫道：「我實在喜歡你，愛你。我接觸到的人不少，但像你這樣肯用心而又有明確認識的人，實在不多。因此，如果可能的話，我倒很願意和你住在一道……」(黃淳浩編 127)儘管郭女兒郭平英指責陳明遠「隨意篡改、炮製郭沫若書信」(郭平英第2版)，但這封信的此句話，郭平英也曾失笑向記者承認：「這封倒是真的。」(李延華 26)此封信以後，在郭的要求下，他們倆開始各自化名通信，郭給陳明遠取名「海英」，自己則以「鼎堂」署名。

隔年5月5日，郭又向22歲的陳明遠示愛：「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就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黃淳浩編 142)這句話重複了上一封信的修辭「喜歡你，愛你。」這些熱情的修辭跟當年向汪少年的示愛：「啊，我真愛你呀！」如出一轍，只不過多了

55 1995至1996年間，郭平英等人訴訟官司的重點，本來是在「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真偽」問題上，《新潮》一書的著作權問題尚在其次。後來法庭宣判，控方在重點問題上證據不足，無法立案，但認為《新潮》一書的著作權確實侵犯了郭的署名權。詳述參見《陳明遠〈歪曲和武斷不解決問題：也談「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的論爭〉》(60)。

56 陳明遠在向郭談心論詩的交往過程中，在六十年代上旬完成了三部書稿，即詩集《新潮》、《詩歌形式探討》和《古典詩歌今譯》。詩集《新潮》，署名為郭沫若原作，陳明遠改寫。1992年為了紀念郭誕生一百週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新潮》，郭平英把出版社和陳明遠控告上法庭，法庭宣判：「陳明遠在出版的《新潮》一書中擅自將郭沫若署名為作者，侵犯了郭沫若的署名權」(《郭沫若學刊》編輯部 79)。其實此書稿郭早在1964年10月致陳明遠信函有提及，並在信裡附上短文《〈新潮〉後敘》，該文郭同意：「這些譯詩也可以認為是我們兩人長期合作的結果」(黃淳浩編 151)。

一份長輩的自重口吻(郭沫若〈我的童年〉 106)。郭最後一次跟陳明遠直接表達愛意，是文革前的1965年7月30日，當時郭已74歲了：

兩個多月了，一直沒有你的音信，使我心中非常牽掛。是不是因為上次立群在家裡發脾氣的事，影響了你的情緒？我真是不安。立群長期患病，你知道的……⁵⁷近年來她的疑心病加重了，曾說我關心你甚於關心自己親生的子女；說我通信太多，跟寫情書一樣……她用辦公室的名義向聲學研究所去調查你的情況，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絕對不允許她那樣去做的……你不是對我有意見了？……我確實非常愛你……我已到晚年，生活寂寞。每次你的談話，你的來信，都給我這個老人帶來喜悅。我天天惦記著你(黃淳浩編 156)。

此封信函最令人玩味，莫不在於郭妻公然對陳明遠「吃醋發難」，還私下通過組織調查陳明遠。可見郭和陳明遠的關係，遠非人們簡單以為的「忘年交」(丁東編《反思郭沫若》 367)。郭在1961年6月1日的信函已向陳明遠試探：「我們之間的感情，不是比一般的師弟還要親切嗎？您不以為這樣？」(黃淳浩編 121) 1965年12月22日的信函，更有一些引人遐想的暗示：「至於你，什麼時候來我都歡迎。我的房門永遠是對你敞開的。余言面敘。」(黃淳浩編 162)。

陳明遠17歲之際，宗白華和田漢要介紹舞蹈家趙青作為明遠女友，第一次見面，19歲的趙青眼裡的陳明遠「臉上白裡通紅，分明是害羞得起了紅暈」(李子遲 8)。這等花容很容易令人聯想起郭的初戀情人汪少年。1961年趙青嫁作人婦，新郎不是陳明遠。正是隔年郭5月9日的信函，郭首次致函向陳明遠示愛，含蓄表達要跟他同居的慾

57 於立群是郭最後一任妻子，1979年在大陸自殺身亡。

望。縱然郭是以「作為一個老朋友，經常關心著你的健康，讓你能好好地成長」為由，但讀者不能輕忽這些含蓄修辭的言外之意，畢竟當時中共整風運動何等嚴厲，即使郭意亂情迷，也不至於有勇氣赤裸裸把愛意和意圖道盡（黃淳浩編 127）。況且他又是一個七十多歲，在黨內有極高地位的政壇老翁，只能藉「詩友」為由，與陳明遠密切交往。

從目前可看到的信函和陳明遠提供的史料看來，他們不止於紙上之交，而且還嘗試避開眾人耳目，在上海或北京會面。1961年同遊上海豫園，這可視為郭晚年的「奮飛」和「遊蕩」。郭即興揮毫〈遊上海豫園〉，以舊體詩贈予陳明遠。不過當時郭非常含蓄，他對明遠說：「今天要把你的名字陳明遠藏在這首詩裡留個紀念。」（陳明遠〈答郭平英的公開信〉 402），然後寫下「小刀會址憶陳劉……日月金錢昭日月……豫園有史足千秋」（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 480）。雖然郭對外自注說：「陳為陳阿林」（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 481），其實「陳為陳明遠」；而「昭日月」的「日月」為「陳明遠」的「明」字的拆寫；⁵⁸而郭寫「園」字時先寫成「遠」字，他當時對陳明遠的解釋更是意味深長：「把你的走之旁加框子框起來吧」（陳明遠〈答郭平英的公開信〉 402）。

本詩的寫作過程，頗稱得上是「愛，無法說出它的名字」⁵⁹在中國的極度含蓄版。即使當年陳明遠無意，但郭確實有心。倘若他倆僅一般的老少詩友關係，郭盡可一如他其他大量的應景詩作，光明正大地在詩題裡標明，把此詩贈予陳明遠，大可不必費盡心思掩人耳目，把名字藏在詩行裡。而且對「遠」字的琢磨最耐人尋味，潛意識流露出了郭想把陳明遠留在身邊的強烈慾望，以免他日這位翩翩少年遠走高飛。

這一老一少的頻密交往，再現晚年郭作為「黨喇叭」的另外一面。

58 大陸學者也同意「日月」疑指「明」字，參見（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 481）。

59 原句「I am the 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王爾德（Oscar Wilde）引述其愛人同志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的著名詩句。該詩題名為〈兩種愛情〉（Two loves）。該詩可參見 <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wilde/poemsofdouglas.htm>（Accessed: 2014.1.4）。

郭在信函裡經常向明遠傾訴他對新中國政治和文藝現狀的無奈：「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黃淳浩編 144)，而且也自我譴責他那些歌功頌德文章的粗糙和造作：

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是我是有自知之明的(黃淳浩編 42)。

陳明遠多年觀察郭，認為「郭沫若在心裡學分類上屬於一種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慾旺盛、豪放不羈；另一方面，內藏、陰鬱煩悶、城府頗深。一方面熱誠仗義，另一方面趨炎附勢。」(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 254)這種極其矛盾的雙重性格，貫穿郭的一生。郭的個人化人格，表現在晚年他對陳明遠的熱烈追求，這種「情慾旺盛」的展露無疑是〈我〉與同性戀詩詞的延續；而他「趨炎附勢」的政治生涯，正是他「理想化」的人格發揮到極端的展現。從表面看，郭「理想化」的人格最後全面壓倒「個人化」人格，但這兩種人格面具(persona)不過是「個體神話」邁向「集體神話」的自我想像而已，在郭生命時間的維度上得到一體兩面的呈現，正如麥克亞當斯指出：「個體神話可被視為一組複雜的想像對話，涉及不同的自我想像如何在敘事時間上展開。」(McAdams 131)郭的自我想像由始至終都在「個人化」和「理想化」人格的對話中持續展開。晚年的郭看似風光，其實內心患得患失，莫名承受著巨大的煎熬：

建國以後，行政事務纏身，大小會議、送往迎來，耗費了許多時

間和精力。近年來總是覺得疲倦。國家對我的待遇過於豐厚。前年搬家，住到這樣大的地方，佔了這麼多的房子，心裡確實非常不安……上次談話時，我說過早已厭於應酬、只求清靜的話，指的是不樂意與那幫無聊之輩交往……（黃淳浩編 162）

這時期他跟明遠的魚雁往返，正好是他釋放這些煎熬和壓力的出口。縱然郭宣稱是基於「為國家愛惜人才」展開和陳明遠交往，這類「同性社交」(homosocial)看似跟同性戀無關，然而在五、六十年代冷戰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特定歷史時空裡，除了借助愛國主義的話語表達對陳明遠的愛意，郭其實別無他徑（黃淳浩編 156）。換言之，在極端國族主義主導的集體神話氛圍下，被壓抑的同性情慾要不是被主體棄絕，不然就是在「同志」(comrade)之間變形與改裝。郭的個案無疑屬於後者。同性情慾被壓抑的結果之一，導致郭熱烈響應和支持新中國的極端國族主義。在研究希特勒納粹文化的黑威特(Hewitt)看來，倘若同性戀總是極度壓抑變成一種無法說出名字的愛，那麼它將會以另外一個名字，說出它無法說出的——法西斯主義(9)。那是一種自我理想化的人格賦予愛國主義的形式：同性情慾的性能量，被轉化為法西斯衝動的精神能量，朝向極權領袖的強大磁場靠攏。歌頌毛澤東成為郭餘生釋放法西斯妄想的重頭把戲。

郭於1949年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無黨派人士獻錦旗「我們永遠跟你走」予毛。建國後郭緊跟毛的詩詞唱和，近乎是每次政治整風運動前夕的意識形態訊號：「詩詞在郭手中變成了政治的晴雨表。」（程光燁 126）這些帶有政治表態的詩詞，往往都是在發生重大政治事件發表，例如寫於文革前夕的詩詞〈水調歌頭：讀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一總分為二，司令部成雙。右者必須炮打，哪怕是銅牆！首要分

為敵友，不許魚龍混雜，長箭射天狼。惡紫奪朱者，風雨起蒼黃。
觸靈魂，革思想，換武裝。光芒萬丈，綱領煌煌十六章。一斗二
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將，浩浩映朝陽。捍衛毛主席，捍衛黨中
央。(楊勝寬、蔡震主編 638)

此詩詞看似毫無詩意，但是朗讀起來卻完全按照傳統中國詞牌名〈水調歌頭〉的典範格式書寫：上下闕，雙調九十五字，上闕九句四平韻，下闕十句四平韻。毛澤東同樣愛寫以〈水調歌頭〉為牌名的古典詩詞。郭既是在形式上附和，亦在內容上表達對毛主席的忠誠。從1949年後至1977年的晚年期間，郭大量炮製這些頌揚毛主席與「敵友分明」鬥爭，以及從思想到靈魂都要自我改造的詩詞。

蘇珊·桑塔格曾指出，無論是法西斯及共產的政治裡，領袖的意志都成為領袖和唱和者之間的戲劇化宣傳(Sontag 92)。郭的這些「政治打油詩」，正是郭對毛澤東作為國家意志的文化宣傳(程光燁 92-103)。其詩文展現的法西斯特質及其複雜性，極易被大陸史家以那套歷史非常時期「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簡單說法掩蓋。無論是在左派或右派的獨裁統治裡，政治與藝術的關係並不是人們以為的藝術只是要為政治服務，而是政治挪用了藝術的修辭及後期浪漫派的藝術觀，成為藝術組成的重要部分(Sontag 92)。用郭附和毛澤東的說辭，這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郭的法西斯特質，體現在他把詩文和國家政治批鬥運動進行文武結合，以及對毛澤東作為理想化形象的膜拜衝動。這些思想和體現幾乎符合易勞逸歸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五大特徵：其一、歌頌國族以及對極權主義的擁戴、其二、支持一黨統治和美化國家領袖；三、國族主義，伴隨對傳統文化價值的重估；四、以集體意志支配個人意志和想望；五、美化暴力和恐怖事物(Lloyd 80-81)。郭以中國傳統詩牌向毛互相唱和，美化戰爭和歌頌革命的暴力，以及對國家領袖的無條件忠誠，在這裡極端國族主義政

治挪用傳統文化的詞牌形式和韻調，把現代革命話語鑲嵌為中國古典詩詞藝術的組成部分。

郭在公把「理想化」人格投注在與毛澤東互相唱和的法西斯集結衝動上，卻在私以「個人化」人格與陳明遠魚雁往返，體現其自我救贖的本能，作為一種對新中國社會威權的回應。1962至1966年向陳明遠示愛的期間，正是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醞釀的非常時期。

在那段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裡，郭頻密勸告明遠，不要發表作品，以免「招來不必要的麻煩」(黃淳浩編 144)。甚至在1965年信函裡深深表達了他對陳明遠安危的焦慮：「不知為什麼，最近以來我總是替你擔心。有空時務必來找我面談。」(黃淳浩編 159)郭對政治整肅的恐懼和反應，流露於信函的字行間。與明遠的親密感情，無論是否只是郭的單戀，這種對同性的感情結構暫且疏緩了郭的緊繃心情，但也應當承認，它終究對當時強大的極左文化革命的抵抗是有限的。1966年陳明遠二十五歲，當年1月5日，郭致函陳明遠，祝他生日快樂，之後兩人從此斷了魚雁往返。1966年底，陳明遠被文革造反派抄家，他和郭的通信原件和詩文稿被查抄帶走，從此這些原件離奇地散失，或下落不明。⁶⁰明遠也被錯打成「偽造毛主席詩詞的反革命分子」，⁶¹身係囹圄，蒙冤十二年，文革以後才被平反，此時郭剛好去世。

文革前夕，郭在1966年4月14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

60 目前讀者可以讀到的部分信函，均是出自當年的手抄本，不是原件。有部分當年郭致陳明遠的書信原件手跡，據郭平英說目前保存在「郭沫若故居」，但她至今還是拒絕向外界公佈這些原件。有些信函郭很可能當年寫了，但最終沒有寄給陳明遠。據悉其中還有一封長達800字的長信，不曾對外發表過。為何這些本該屬於收信人陳明遠的原件，會在後來被轉到「郭沫若故居」？郭平英的解釋是1963年後郭曾以委婉的方式通知陳明遠退還復信的原件，但陳明遠撰文反駁說「我本人從來沒有接到這樣的**通知**」，並且公開呼籲「**必須把『郭沫若故居』所保存的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原件手跡全部如數退還給我，不得繼續隱藏，更不得秘密銷毀。請注意，收信人是陳明遠，而不是郭平英。**」(陳明遠〈答郭平英的公開信〉 403-404)。

61 這又是另一宗離奇的文革冤案，詳述參見(石灣〈郭沫若與陳明遠〉 329-353)。

議，作了一次足以總結他法西斯衝動和自我改造的即席發言：

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的思想……我是連續到自我改造來看的……現在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寫的東西比我們好。特別是我們拿筆桿子的人，搞文藝、搞歷史、搞哲學的人，必須深刻地反省。我自己感到很難受，實在沒有改造好。（王繼權、童煒鋼 406）

這句話一筆勾銷自己以往所有作品包括〈我〉的意義，其殺傷力的徹底性，顯然比任何一次郭對自己作品的刪改，來得更具有毀滅性。此「焚書」宣言不斷提到自己沒有把自我改造好，這種否定的否定，不斷「自我改造」讓自我遷就於「集體神話」的訴求，不正是重複當年〈鳳凰涅槃〉的法西斯思想特質嗎？果然不久以後，即1967年下旬，他為自己這番「焚書」宣言巧辯：「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黃淳浩編 409）。

五、結論

從1920年的〈鳳凰涅槃〉到1966年的「焚書」宣言，兩次郭向世人宣告他的「自我改造」，也正是他徹底否定過去，包括否定自己同性愛行為的開始。本文指出郭一生從「同性戀」到「走向革命」的徵候，那是一段自我改造的漫長過程。這些「自我改造」不是郭或其他學者以為的「自我昇華」，而是郭的「個體神話」邁向「集體神話」的「自我形塑」過

程中，同性情慾被極端國族主義壓抑變形後，不幸轉化為法西斯衝動的結果。

郭的同性情慾在「自我改造」多年後，並沒有從根本上被革命論述去除，反而成為他每次面對革命挫折後，從理想化的人格撤退到個人化人格的自我想像和自我保護。每當郭的革命生命面臨險境，他會潛意識地通過書寫，重新召喚被壓抑的同性愛慾望，作為一種對當下精神環境的抵抗和回應。1928-1929年亡命日本之際通過書寫〈我〉召喚同性情慾，是他對國共合作失敗、北伐革命挫折後被國民黨清算的抵抗。1960年代藉魚雁往返向陳明遠含蓄示愛的期間，正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陸一觸即發的非常時期，郭對革命論述的厭倦和失落，坦白流露於寫給陳明遠的私函中。究竟是什麼內心驅動力讓郭不惜冒著被黨國整肅的風險，跟陳明遠保持著長達十多年的親密情誼？甚至在信函裡有勇氣表達了他對新中國政治現狀的不滿？我以為正是革命前夕的「偷營」、「奮飛」和「遊蕩」，這些同性愛經驗「所代表的感情結構，提供了這種反對當道、選擇自外於主流的表意可能」，並成為郭一生吸納與排除革命幻滅的情感力量依據（朱偉誠〈國族寓言下的同志國〉99）。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丁東編。《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 上海圖書館編。〈郭沫若著譯分類書目〉。《郭沫若研究資料》下卷，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333。
- 〈少年中國學會蘇州大會宣言〉。《少年中國》4：8（1923.12）：1-4。
- 司馬遷。《史記新譯（八）列傳三》，韓兆琦註釋。台北：三民書局，2008。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 王繼權、童焯綱。《郭沫若年譜》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 王繼權、姚國華、徐培均。《郭沫若舊體詩詞繫年註釋》（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 王光祈。〈「少年中國」之創造〉。《王光祈文集》，四川音樂學院、成都市溫江區人民

- 政府編。成都：巴蜀書社，2009。
- 史劍。《郭沫若批判》。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 石灣。〈郭沫若與陳明遠〉。《反思郭沫若》，丁東編。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329-353。
- 田漢。〈田漢致郭沫若函〉。《三葉集》，田昌、宗白華、郭沫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6-28。
- 〈同志亡國論侯水盛道歉〉。台灣《蘋果日報》，頭條要聞。2003.12.22。
- 朱偉誠。〈詭異的鏡像：透過馬婁的《愛德華二世》來看中國古典男色的「君臣篇」〉。《同志研究》，何春蕤主編。台北：巨流圖書，2001，239-278。
- 〈國族寓言下的同志國：當代台灣文學中的同性戀與國家〉。《中外文學》36：1（2007）：67-107。
- 吳下阿蒙編。〈斷袖篇〉。《中國香艷全書》（第二冊），蟲天子編，董乃斌等校點。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1046-1065。
- 沈從文。〈論郭沫若〉。《郭沫若研究資料》中卷，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76-82。
- 肖露丹。〈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真偽之辯〉。《反思郭沫若》，丁東編。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374-384。
- 宋耀宗。〈對郭沫若前期思想發展的一些理解：讀《沫若文集》札記〉。《郭沫若研究資料》中卷，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25-44。
- 吳友三。《法西斯運動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李子遲。〈愛情等待：著名舞蹈家趙青與詩人陳明遠的詩舞因緣〉。《女性天地》8（2002）：8-10。
- 李延華。〈「郭沫若官司」採訪實錄〉。《法律與生活》11（1997）：24-26。
- 李潔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 宗白華。〈宗白華致郭沫若函〉。《三葉集》，田籌昌、宗白華、郭沫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4-25。
- 林紓。〈《埃及金塔剖屍記》譯余剩語〉。《林琴南書話》，吳俊標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2-23。
- 林紓。〈《埃司蘭情俠傳》序〉。《林琴南書話》，吳俊標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30。
- 周恩來。〈我要說的話〉。《郭沫若研究資料》上卷，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445-450。
-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
-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第四冊（1923-1927）》，曹伯言整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 哈葛德。《伽茵小傳》，林紓、魏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 姜義華、張榮華。〈大同書·按〉。《康有為全集》第七集，康有為，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
- 郝嵐。《林譯小說論稿》。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 郭平英。〈陳明遠與郭沫若書信往來質疑〉。《文藝報》，第2版。1996.5.10
- 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五四人的悲劇型像及其分析》。臺北：百傑出版社，1978。
- 《郭沫若學刊》編輯部。〈郭平英等訴郭老著作被侵犯：陳明遠等敗訴〉。《郭沫若學刊》1(1997)：79。
-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華書局，1929。
- 《幼年時代》。上海：光華書局，1933。
- 〈我的童年〉。〈少年時代〉，《沫若自傳》第一卷，郭沫若。上海：海燕書店，1947，1-170。〈〈我的童年〉原以單行本面市，後來於1958年被郭沫若收編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成為全書其中一篇自敘傳。由於本文出自〈我的童年〉的引文，大部分是引自《沫若文集(第六卷)》，因此本文是以標點符號〈〉處理〈我的童年〉，而不是以《》表示〉。
- 〈我的童年〉。《沫若文集》第六卷，郭沫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2-151。
- 〈我的童年(後話)〉。《沫若文集》第六卷，郭沫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51。
- 〈少年時代[序]〉。《沫若文集》第六卷，郭沫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2。
- 〈反正前後〉。《沫若文集》第六卷，郭沫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53-263。
- 《學生時代》。香港：三聯書局，1978。
- 〈革命與文學〉。《郭沫若研究資料》上卷，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226-235。
- 《〈文藝論集〉序》。《郭沫若研究資料》上卷，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216-217。
- 《郭沫若和兒童文學》。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90。
- 〈郭沫若致宗白華函〉。《三葉集》，田壽昌、宗白華、郭沫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0-38。
- 〈鳳凰涅槃〉。《〈女神〉校釋》，郭沫若，陳永志校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45-68。
- 〈從詩人節說到屈原是否是弄臣〉。《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十卷：天地玄黃／其

- 他》，郭沫若、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合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75。
- 〈離滬之前〉。《革命春秋》，郭沫若。香港：三聯書店，1978，256-285。
- 陸小曼編。《志摩日記》。上海：晨光出版社，1949。
- 陳明遠。〈答郭平英的公開信〉。《反思郭沫若》，丁東編。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390-404。
- 〈湖畔散步談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丁東編。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248-263。
- 〈歪曲和武斷不解決問題：也談〈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的論爭〉。《北京觀察》2（2001），60-62。
- 陳源。《西滄閒話》。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
- 陳宇。《「自我」形象的塑造、改寫與重構：〈沫若自傳〉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
- 黃士嘉。《晚清教育政策演變史（1862-1911）》。臺北：心理出版社，2006。
- 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梁啟超。《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20冊，蔣貴麟編。臺北：宏業書局，1976。
-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全集》，張品興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99。
- 康有為。《大同書》。《康有為全集》第七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3-188。
-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臺北：麥田，2012。
- 許維賢。〈從「荒域」到「V城」：王韜和董啟章的香港故事與男性建構〉。《南大語言文化學報》7.1（2008）：181-222。
- 彭小妍。〈一個旅行的現代病：「心的疾病」、科學術語與新感覺派〉。《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34（2003）：205-248。
- 程光燁。《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76）》，臺北：秀威，2006。
- 湯志鈞。《康有為傳》。臺北：台灣商務，1998。
- 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臺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2。
- 傅錫壬註釋。《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3。
- 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〇年代中國政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8。
- 馮錫剛。《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 楊貞德。《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 究所，2009。
- 楊勝寬、蔡震主編。《郭沫若研究文獻匯要(卷六：文學·詩歌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 新蕾出版社編輯部。《我的童年》。天津：新蕾出版社，1980。
- 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學生書局，2000。
- 〈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丁乃非、劉人鵬編。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2011，33-68。
-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2004。
- 劉詠聰。《中國古代育兒》。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2000。
- 蔡玫姿。《親臨陌異地：五四作家跨國經驗形構的文學現象》。高雄：巨流，2010。
- 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北京：文化藝術，2005。
- 〈在與國共兩黨的關係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論與此相關的史料之解讀及補充〉。《郭沫若學刊》1：79(2007)：20-27。
- 盧正言。〈郭沫若年譜簡編〉。《郭沫若研究資料》上卷，王訓昭、盧正言等人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1-124。
- 盧梭。《懺悔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3。
- 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天津：天津人民，1982。
- 西文部份
- 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Robert Baldick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 Braudy, Leo. *From Chivalry to Terrorism: War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5.
- Chow, Rey. "The Fascist Longings in Our Midst", in Rey C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4-32.
- Crossley, Michele L.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2000].
- Foucault, Michel. *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 (Alan Sheridan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Freud, Sigmun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Avon, 1962 [1905].
- Freud, Sigmund. "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I) (Trans under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7[1911].
- Giddens, Anthon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 Eroticism in Modern*

- Socie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Gulik, Robert Hans van.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Leiden : E.J. Brill, 1974.
- Haggard, H. R. *Joan Haste*.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02.
- Hewitt, Andrew. *Political Inversions: Homosexuality, Fascism and the Modernist Imagina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Holden, Philip. *Autobiography and Decolonization: Modernity, Masculinity, and the Nation-State*.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8.
- Kang, Wenqi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 P, 2009.
- Krafft-Ebing, Richard von. *Psychopathia Sexualis :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tipathic Sexual Instinct , A Medico-forensic Study*. New York : Stein & Day, 1965.
- Lee, Ou-fan Leo.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 Louie, Kam.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cAdams, Dan P. *The Stories We Live by : 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1993].
- Neocleous, Mark. *Fascism*.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 Passmore, Kevin.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ang, Tze-lan Deborah.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Song, Geng.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ontag, Susan. "Fascinating Fascism," Sontag, Susan,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80.
- Tod Roy, David. *Kuo Mo-jo: The Early Yea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網路資料
- Douglas, Alfred. "Two loves," <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rtrial/wilde/poemsofdouglas.htm> (Accessed :2014.1.4)